

清华大学

硕士 学位 论文

失衡还是平衡：农村老年家庭的代际关系与养老行为

专业名称：社会学

作者姓名：林志勇

指导老师：裴晓梅

失衡还是平衡：农村老年家庭的 代际关系与养老行为

(申请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论文)

培养单位：社会科学学院
学 科：社会学
研 究 生：林 志 勇
指 导 教 师：裴 晓 梅 教 授

二〇一四年六月

Balance or Unbalanc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Old Age Support in Rural China

Thesis Submitted to
Tsinghua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in
Sociology
by
Lin Zhiyong

Thesis Supervisor: Professor Pei Xiaomei

June, 2014

摘要

本文关注人口老龄化和农村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问题，试着从老年亲代的视角去理解老年家庭代际关系中的子代赡养行为如何受其他代际关系层面的影响。结合家庭现代化和代际关系相关理论，本文对当前代际失衡还是平衡的争论给出自己的解释，并探讨保障农村老年人晚年多元需求的有效机制。

基于中国 3 省 19 村 756 个亲代老人样本和老人报告的 2630 个亲子配对样本数据的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 农村老年亲代在家庭周期的各个阶段对子代投入很多，66% 的老人曾经为子代盖房，将近一半的老人目前为子代提供各类非经济支持。但是这种投入并没有保障晚年代际间的亲密关系，仅有 46% 的亲子关系被认为是亲密的，且呈现较大的性别和年龄差异；2) 代际功能关系在经济赡养行为上得到了一定的平衡，约 72% 的亲代获得了子代经济支持，而且抚养更多子代、为子代盖房、给予子代照看孙代能够显著提高获得子代经济支持的概率。但这种平衡在子代情感支持上不再成立。55% 亲代老人能够获得子代情感支持，但这种支持并非源于他们对子代的各类支持，而是受家庭中的代际亲密关系程度的影响；3) 代际亲密关系的维持上，虽然亲代和不同居住距离的子代在亲密程度上没有显著的差别，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维持机制。对于在身边或者附近的 58% 的子代，老人通过家务照料上的付出维持亲密性，而对于剩下的 42% 在外地的子代，亲密关系则是源于亲代在照料孙代上的付出；4) 另外，老人的需求和老人的家庭地位也是影响子代养老行为和代际亲密关系的重要因素。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验证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解释，并从代际关系视角重新审视农村代际关系失衡及其导致的养老危机问题。本文发现家庭边界在现代化变迁中依然涵盖了老年亲代和成年子代两代核心家庭，代际互动频繁，养老行为维持了一定的平衡。但同时，相比亲代对子代越来越多的投入，亲代能够从子代处获得的回馈则处于一种情感缺失的不确定性当中，代际间亲密关系的维持机制正面临重构。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认为较为理想的代际关系是一种亲子间有限责任、突出亲情关系、关注老年人多元需求的亲密关系。

关键词：代际失衡；老年家庭代际关系；养老行为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nvestigates the issues of family supporting in rural China by examining various dimens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later life. Relying on family moderniz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 theories, the author replies to the debate of intergenerational balance or unbalance topics.

Using data from 756 old parents and 2630 parent-child pairs in 19 Chinese villages, the author concludes in four parts. 1) Elderly parents have paid a lot for children in different family stages, such as 66% of them built house and nearly half are still providing much assistance for children. However, only 46%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re reported intimate; 2) Intergenerational balance is kept when considering children's economic support for elderly. About 72% of elderly parents received money from their children last year, and people who have more children, ever built house for children, and cared grandchildren can be more possible to get this. But this balance is not suitable in the behavior of emotional support, in which not the investments of parents but the intimate relations that really work; 3) Mechanism of maintaining intimate relations with adult children differs between nearby and migration ones. For nearby children, who occupy 58%, elderly parents maintain intimate relations through providing housework support. And for the migration ones, these derive from grandchildren care; 4) Needs of parents and their status in family are also significant factors affecting old age support.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s of this dissertation lie on it not only tests hypothesis raised by modernization theory, but also reexamines the issues of "intergenerational unbalance" under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 theorie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borders of family remain covering families of parents and adult children, which is shown as frequent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s and old age support.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increasing input of parents, returns from children are under uncertainty because of lacking emotion. So the author proposes an ideal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as limi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emotional intimate relations.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Unbalanc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Later Life; Old Age Support

目 录

第 1 章 问题的提出	1
1.1 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家庭代际关系	1
1.2 农村社会变迁与老年人晚年保障	2
1.3 核心问题：老年家庭代际关系的失衡与平衡	3
第 2 章 文献综述	5
2.1 理论脉络与核心概念	5
2.1.1 现代化理论：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	5
2.1.2 代际关系理论：从范式化到多样化	6
2.1.3 其他理论视角的介入：生命历程、性别、空间	8
2.2 主要发现与争论	9
2.2.1 家庭结构变迁与代际失衡	9
2.2.2 代际交换关系中的失衡	11
2.2.3 家庭观念变迁与代际失衡	12
2.2.4 多代关系与代际失衡	13
2.3 述评：代际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14
第 3 章 研究设计	15
3.1 分析框架与问题假设	15
3.2 数据与方法	16
3.2.1 数据介绍	16
3.2.2 变量的测量	17
3.2.3 分析方法	19
第 4 章 农村老年家庭代际关系现状：亲代视角	20
4.1 代际功能关系	20
4.2 代际情感关系	22
4.3 亲代家庭地位	24
4.4 本章小结	25
第 5 章 代际关系与养老行为	27
5.1 代际关系与子代经济支持	27
5.2 代际关系与子代情感支持	29

5.3 本章小结	32
第 6 章 农村老年家庭代际亲密关系的维持	34
6.1 如何维持代际间的亲密关系？	34
6.2 子代移民背景下代际亲密关系的维持	37
6.3 本章小结	39
第 7 章 结论与讨论	40
7.1 研究结论	40
7.2 假设验证与理论回应	42
7.3 讨论与不足	43
参考文献	45
致 谢	50
声 明	51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52

第1章 问题的提出

1.1 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家庭代际关系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和与之相伴的对老年人照料和支持的关注，代际关系研究成为家庭与老龄化研究的重要维度（Silverstein et al, 2010）。所谓代际关系，既包含宏观层面的以社会人口结构中定义的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之间的以社会保障为纽带的资源转移机制，也包含传统文化规范制约下的家庭内部不同年龄阶段的家庭角色间的抚育-赡养关系。本文的关注点无疑在后者，具体来讲家庭代际关系可以定义为上下代之间所形成的抚育、赡养、继承、交换和交往关系（王跃生 等, 2011）²，根据侧重对象的不同存在研究视角的差异。本文试着从老年亲代的视角去理解老年家庭代际关系中的赡养行为如何受其他代际关系层面的影响。老年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未富先老”的客观现状决定了社会代际关系为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尚需时日，目前的中国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具体来说就是依赖家庭代际间的互动。因此，家庭如何在资源限制的条件下，策略性地以最优的方法去满足个体和集体需求，成为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Silverstein, 2006）¹⁷⁵。

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代际关系重要性的上升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同时代际关系本身也受社会变迁的影响。根据联合国人口部门的预测，中国 60 岁以上的人口将从 2010 年的 12%，上升到 2050 年的 34%，相当于在欧洲需要 80 年时间完成的过程，中国只用 20~30 年就能达到（Hivistendahl, 2013）。而根据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重达到 13.26%，65 岁以上是 8.87%，总数约为 1.23 亿人，全国家庭户中有 65 岁以上老人生活的家庭合计达到 21.89%，农村则高达 25.94%（张翼, 2013）。随着老年人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的同步增长，家庭当中老年亲代和成年子代间将有更多共享的生命历程（shared lives）和互动，同时代际关系也将面临更多复杂的问题。所以美国著名老年学家本特森（Bengtson, 2001）¹⁴甚至预测 21 世纪的家庭研究中，多代关系（含代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将会逐渐超越核心家庭。当然，家庭代际关系本身也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并影响老年人的晚年保障。代际关系在当今中国的不同地区呈现不同形式的差异，城乡差异尤为明显，因为在城乡二元制及其影响下的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导致农村家庭养老对代际支持的需求更高，而农村社会的变迁又给农村老年人的晚年保障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1.2 农村社会变迁与老年人晚年保障

如前所述，在当前中国，由于为老年人服务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家庭依然是老年人晚年保障的主要依靠，而这在农村更为突出。根据中国家庭动态调查（CFPS）最新数据显示农村 60 岁以上老人得到子女经济帮助的比例是 49.9%，远高于城市，而给予子代经济支持的比例仅为 8.1%（许琪 等, 2013）。而另一项对于农村家庭的调查也发现，三分之二的老年人在经济支持上依赖子代（Cong et al, 2011）⁹³。不仅仅是经济支持，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上，农村老年亲代也对子代有着很多期待，而这种非经济需求也将随着社会保障的完善更加突出。所以养老行为可以理解为家庭代际关系的一项重要的功能性内容，而代际关系也可以概念化为养老行为的结构性条件（陈皆明, 2010）⁴⁶。然而“唯一性就是脆弱性”（孟宪范, 2008）¹⁴⁰，当家庭成为老年人的主要依靠时，他们在社会变迁面前也变得异常脆弱。

社会转型对农村老年代际关系的影响相比城市更为突出，传统上亲代依靠家庭财产的控制所维持的代际关系不再有效（陈皆明, 1998）¹³¹，代际关系随着时代变迁呈现时期差异（王跃生, 2011b），这种差异不仅包括代际关系内容、对象上的差异，也包括关系维持潜在机制和功能上的差异。目前农村的养老困境是，一方面，农村的变迁比城市更为突出，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多重冲击导致农村宗族社会消失、社会组织崩溃、亲情关系淡漠（徐晓锋, 2010）⁵⁹；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因素，农村老人缺乏自身养老资源的积累，只能依靠传统家庭规范下的子代赡养。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维持一种恰当的代际关系，以保障高度不确定的转型时期的养老行为，便是本文分析的一个出发点。

科利（Kohli, 2004）对社会学中的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研究做了结构、制度和文化三个维度的区分，并分别从家庭人口学构成、调节家庭关系的制度因素和变迁中的传统和价值观角度去审视。借鉴此种思路，笔者认为根据现有的研究，可以从三个层面总结目前影响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的农村社会变迁力量：1) 城市化过程中，诸如城乡劳动移民等趋势所导致的家庭人口学结构的变化，包括居住模式、家庭结构及其影响下的老年人支持网络的变化（金一虹, 2010, 刘汶溶, 2012b, 潘鸿雁, 2008, 宋璐 等, 2011, 王萍 等, 2011, 张烨霞 等, 2007, Cong et al, 2011, Guo et al, 2011, Luo et al, 2012）；2) 国家权力和市场冲击下原有传统代际互动逻辑的变化，包括对代际权利义务关系、地方性共识等的影响（郭于华, 2011, 贺雪峰, 2008, 王跃生 等, 2011, 徐晓锋, 2010, 阎云翔, 1998, 张卫国, 2011, 赵爽, 2010, Pei et al, 2010）；3) 最后一点，也是目前讨论比较多的，传统农村“养老情理”的变化和子代的个体化倾向（范成杰, 2009, 刘岩, 2010, 孟宪范, 2008, 阎云翔, 2006）。总之，

农村社会变迁对传统上依赖子代的农村老年人养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保障老年人的晚年需求成为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

1.3 核心问题：老年家庭代际关系的失衡与平衡

面对农村社会变迁对农村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分别从亲代和子代角度出发去讨论代际关系与养老行为，结果却呈现两种不同的倾向。从亲代角度的研究认为，在农村的社会变迁中，主要是老年人做出了大量牺牲，比如贺雪峰（2008）¹¹² 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代际关系严重失衡，尽管父母依然为子女耗尽心机，子女的不孝却越来越严重，有学者描述其为“眼泪往下流”（刘桂莉，2005），甚至是“道德领域荒漠化，人伦丧失”（孟宪范，2008）¹⁴²。而从子女角度的研究，则为上述“不孝”的子代做出辩驳，认为中国家庭中的代际流动仍然以子代到亲代的向上流动为主，家庭凝聚力依然强大（杨菊华 等，2009），而且代际养老功能的衰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社会结构性压力在家庭中从子代到亲代的转嫁（刘汶溶，2012a），应该关注家庭之外社会变迁的影响。笔者认为当前代际关系与养老行为的讨论不能仅仅停留在“孝道”等文化层面，而是应该看到背后的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本文试着从其中代际失衡还是代际平衡的争论出发，去剖析代际关系与养老行为相关的问题。

所谓代际平衡，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往往都是代际关系的某一个维度进行定义，比如亲子间抚养-赡养的平衡（贺雪峰，2009）⁸⁷、子代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刘晋飞，2012）¹⁵⁶、亲代期待与回报的平衡（王跃生，2012）及亲代需求与子代支持的平衡（王跃生，2011b）等等，而与之对应的便是代际失衡。代际关系失衡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目前大部分研究都认为农村代际关系失衡，影响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其需求得不到满足，甚至导致老年人自杀等种种悲剧（陈柏峰，2009）。种种现象似乎预示着家庭的边界开始收缩到个体化的核心家庭，赡养老年亲代的功能似乎不再是子代必不可少的任务，传统的家庭关系理论似乎在解释当下家庭养老行为时遇到困境，家庭代际关系在社会变迁背景下面临重构。

笔者认为已有的研究更多只是从代际关系某个层面去评价，没有综合考虑代际关系的复杂面向。本文试着把代际失衡问题放到现代化理论、代际关系理论和其他相关理论脉络中去讨论，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代际失衡。并且本文试着利用中国农村的实地调查数据，去分析农村社会变迁是否导致老年家庭代际关系的失衡，进而讨论这种失衡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导致情感关系的失衡，还是功能关系的失衡，抑或两者的共同缺失等问题。只有弄清具体代际关系层面上的失衡还是平衡，我们才能找出家庭养老所面临的困境症结在哪里，从而进一步去讨论

解决目前农村养老困境的思路。

至此，本文将提出两个具体问题：1) 亲代对子代不同时期的支持能否保证晚年从子代处获得养老所需的各类回馈；2) 代际情感关系是否随着社会变迁逐步衰退，而这是否又影响老年亲代晚年支持的获得。

另外，本文试着从如下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做出补充和推进：1) 在代际功能关系上，考虑亲代在不同生命阶段对子代的各类支持，而不仅仅局限于短期经济支持；2) 而在代际功能关系基础上，加入情感关系去讨论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及代际功能关系的潜在机制；3) 控制家庭层面的异质性，关注家庭内部单一亲代与所有子代间的代际关系。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对如下两个问题的思考提供一些实证线索：1) 现代化冲击下传统中国家庭的边界在哪里？2) 西方的代际关系理论视角对我们认识代际关系多样性的贡献有哪些？而中国的代际关系模式又能对西方代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哪些思考？

第2章 文献综述

2.1 理论脉络与核心概念

2.1.1 现代化理论：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

现代化理论关注社会变迁对家庭的影响。基于此，本特森将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历程总结为四个假设的前后更迭：“现代”核心家庭的兴起→“现代”核心家庭的衰弱→日益增长的家庭形式的异质性→多代连结（Multigenerational Bond）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Bengtson, 2001）²⁻⁵。其中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起点，同时也是最为持久的争论就是著名的“家庭分离”假说，即横向的婚姻关系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被强化，而纵向的亲子关系将被弱化，其背后的逻辑就是核心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的适应性，认为夫妇核心家庭所倡导的个体平等、独立和自由的观念是与工业化所需的价值观相吻合的（唐灿, 2010）²⁰²⁻²⁰³。家庭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问内成了家庭研究中区分“现代”与“传统”的主要工具，而老年亲代被排除在了“现代”家庭的范畴之外。与亲属联系紧密的大家庭成了一种“神话”，大规模的、亲属之间有更多联系的家庭被认为是传统的、落后的，似乎只有工业化催生的新兴的核心家庭才是现代家庭的标榜。然而，随着结构功能主义逐渐接受质疑，在家庭研究领域，研究者们也开始对过去核心家庭研究范式的一元化和单线演进思维进行了反思，逐步接受家庭变迁存在多种路径和复杂模式的可能性（唐灿, 2010）¹⁹⁹。而历史学家们也发现西方社会中核心家庭其实在过去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家庭结构不应该成为评判家庭现代性的唯一指标。而在中国的一些研究也发现仅仅通过家庭结构的客观表象就提出的所谓大家庭的衰弱，不能准确反映当前家庭结构变迁背后复杂的逻辑，进而低估家庭凝聚力，家庭结构仅仅是一种家庭应对社会挑战的决策的形式而已（徐晓锋, 2010, 许琪, 2013, 阎云翔, 1998）。

随着家庭结构范式的种种局限性，加上个体化视角在西方家庭研究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家庭研究分析的焦点逐渐从家庭本身结构研究转移到了家庭个别成员关系研究中。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伯吉斯（Burgess）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就对“家庭是否失去重要性”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认为家庭从一个基于法律和习俗的机制（institution）转变为基于情感连带的伴侣性关系（companionship），而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核心家庭的夫妇关系上（转引自 Bengtson, 2001）¹³。对于家庭关系的定义，过去的研究总结为三点：私人家庭关系即夫妇婚姻关系、家庭

与亲属群体的关系及家庭与社区的关系（唐灿, 2010）²¹²。伯吉斯显然只关注到了家庭关系复杂面向中的核心家庭关系这一层面。对此，本特森曾作如下评论：“也许他的观点在过去几十年没有错，但是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迁超出了核心家庭的范畴，多代间联系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会在 21 世纪超过核心家庭”（Bengtson, 2001）¹⁴。对于这一论断，本特森给出了三点解释：1) 人口预期寿命增长，代际间的共享的生命历程的增多；2) 婚姻的不稳定性及单亲家庭的增加，核心家庭的功能日益减退；3) 面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种种挑战，核心家庭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家庭成员个体的多元化需求。

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家庭现代化理论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的转变；从重夫妻关系、轻代际关系到两种关系并重的转变。其中家庭代际关系不仅对亲代，对子代也是在应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各种挑战的过程中所能够依赖的非常重要的家庭资源。结合家庭结构研究和家庭关系研究的争论，我们要问的是，当前社会中，家庭的边界在哪里？是局限于核心家庭的夫妇关系还是包含纵向的亲子关系？现代化理论对于本文所要讨论的代际失衡问题的启示是，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与其说是衰退，更有可能是一种重构，而失衡只是一种过渡状态，代际间的互动或许正在朝着一种新型关系的方向调试，而我们或许更应该关注这一调试过程。

2.1.2 代际关系理论：从范式化到多样化

承接现代化理论对家庭研究的争论与反思，代际关系理论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团结型代际关系（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范式。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和本特森（1997）⁴²⁹ 在批判以往代际关系研究过分强调代际间既存功能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代际团结的三个潜在维度，即代际关系的亲密性、机会结构和家庭功能。他们认为，如果仅仅关注代际间正在进行的功能性交换，会低估代际连带的强度，进而夸大代际凝聚力下降的程度。代际团结理论将代际关系分为基于情感连带的“潜在团结（Latent Solidarity）”和基于功能连带的“显著团结（Manifest Solidarity）”（Swartz, 2009），并推导出五种代际关系理想类型。而当利用代际团结理论分析美国家庭的时候，西尔弗斯坦和本特森发现，没有一种代际关系类型占绝对的主导，并认为概括出一种“模式化”的代际关系理论具有明显的误导性（Silverstein et al, 1997）⁴⁵⁰。虽然后来的研究批评代际团结理论带有一种范式化的倾向，忽视了团结背后潜在矛盾（Lüscher et al, 1998），但是代际团结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代际关系多样性的开放性视角，而且后来的代际团结理论也没有停留在某个范式，而是更多地从实际社会背景出发，去观察代际关系的多样化变

迁。

基于代际团结理论的情感关系和功能关系的思考路径，及代际失衡背后可能存在的多种原因和背景，代际失衡与平衡与否可以通过如下四种不同的分类去思考和分析：

表 2.1 代际平衡与失衡类型表

亲密的代际关系	非亲密的代际关系
能够获得代际支持	团结型平衡
不能获得代际支持	结构型失衡

上述表格是基于亲代家庭养老支持获得与否和代际亲密关系程度进行的代际平衡与失衡类型的划分。如果亲代能够通过与子代建立亲密的关系获得所需要的各类代际支持，满足潜在团结和显著团结的要求，本文认为它是一种团结型平衡。相反，如果既不能保持亲密的代际关系，又不能获得必要的家庭支持，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疏离型失衡。这两者是两种极端理想型分类，而现实当中我们更可能看到的是两者的折中。对于代际关系亲密，但是不能获得支持的情形，这很有可能是由于居住距离、性别差异、收入状况等结构性因素导致，我们称之为结构型失衡。而对于虽然获得基本的亲代支持，但不是基于情感性自发，而是基于各种规范、义务、责任等的驱使，我们称之为义务型平衡，这种平衡相比团结型平衡具有更多不确定性，而且往往不能考虑到亲代的多元化需求。

对于本文所重点关注的家庭养老行为，目前的代际关系理论着重讨论功能互动关系背后的逻辑与动机。完整的代际关系被认为首先是一个功能的平衡关系，在不同的生命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功能性互动内容，同时亲情关系始终贯穿于生命周期（王跃生，2011b）¹³⁵。基于此，在承认代际关系多样化的基础，代际互动的动机研究也呈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对于家庭代际互动动机的解释最为经典的无疑是经济学家贝克尔的利他动机解释（Becker, 1992）及其罗登·凯德定理：每一个利他主义受益者，无论他多么自私，都会使其捐助人（benefactor）的家庭收入最大化，从而把他对其他利他主义受益者的影响的全部效应内部化（贝克尔，2009）。在这种前提下，代际关系的理想类型是，利他的亲代在利他子代有需要的时候全力进行投资，进而提高子代的回馈能力，使家庭功能最大化，亲代和子代的情况都会变好。但这种理想化的形态，在现实中不是很普遍，代际互动的动机要复杂很多，对利他动机的批判最为显著的是议价权力解释。对传统家庭财富转移的研究指出，亲代通过控制和分配家庭资源来控制代际关系。在代际权力关系

视角下，当前社会转型地区的代际失衡的原因是源于亲代权力的丧失和子代权力的上升，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多种解释。而在市场化和城市化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当前的代际关系是一种类似于市场契约的“代际契约”，这也许可以解释为“公平逻辑”（郭于华, 2011），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家庭代际间的互惠和策略性协商过程。这种互惠型代际关系既包含贯穿生命历程的一般性互惠（general reciprocity）（Silverstein et al, 2002），也包含短期内的时间（亲代家务付出）-经济（子代金钱回馈）交换（陈皆明, 1998）。总之，我们目前还不能通过某一种视角去解释代际互动变迁背后复杂的故事。

老龄化和家庭研究领域中，现代化理论受到不断的质疑、批判和修改，而代际团结理论也努力从一种范式化转变到多样化的视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代际关系研究没有一个支配性的宏观理论，但是同时多种中层理论的介入同样推动了这个领域的进步，比如生命历程、性别、空间等理论就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代际关系与养老行为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2.1.3 其他理论视角的介入：生命历程、性别、空间

本文的主要视角还是基于上述两种理论脉络。但是同时，生命历程、性别和空间相关的理论也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一些补充性的视角，这些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代际关系的本质和变化。

首先是生命历程视角。对于生命历程视角下的代际关系研究，哈雷雯认为（Hareven, 1994）⁴³⁹ 应该将个体时间、家庭时间和历史时间结合在一起，去分析代际关系变迁的复杂性。而后来的变迁研究则发展出了年龄（Age）效应、时代效应（Period）、世代效应（Cohort）三重分析视角。王跃生等对冀东村庄的研究（2011）²⁸⁷⁻³⁰⁵ 很好地秉承了这一点：经济结构的变迁导致非农经济成为主要收入，子代经济能力强于亲代，进而导致代际财富转移重要性的降低及随之而来的子代赡养积极性的下降；而年龄效应体现在代际交换的长时段特征，即经历青年子代与中年子代、中年子代与老年亲代两个过程，第一阶段的质量对第二阶段的赡养水平有直接关系；最后的世代效应，则通过同辈人所经历的共同历史事件角度出发，指出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是一个地位比较尴尬的群体，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完成生育，在劳动力黄金时期度过集体经济时代，导致他们哺育负担重，而积累能力有限，而进入老年时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尚未建立，不得不对传统养老方式形成依赖。通过生命历程观察代际失衡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代际互动的长时段性，进而分析贯穿生命阶段的情感关系的维持及不同生命阶段代际互动的特点。

性别视角虽然不是与代际关系直接相关的理论，但始终与代际关系理论交织

在一起，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领域，这在传统父权制家庭下的中国尤为明显。不同性别的亲代与不同性别的子代间的互动可以为代际关系多样性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线索，比如基于农村的调查数据分析就发现，虽然不同性别老年人的代际支持行为模式都符合利他/合作群体模型，但老年母亲由于对子代的依赖性上更强，进而与子代的交换也更加频繁（宋璐 等, 2011）²⁰⁹；基于同样的数据另一项研究也指出，亲代承担的照料孙代任务，如果是女儿的孙代并且通过这种照料获得互惠型支持的话，老年亲代的心理健康会变得更好（Cong et al, 2008）。而越来越多的研究也把目光投向了养老的性别分工，及其中女儿重要性的提升，这在农村尤为明显。唐灿等（2009）³⁰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一些农村地区女儿赡养的风俗，并认为这是家庭养老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农村家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家庭策略行为。阎云翔（2006）¹⁹⁸的研究也发现，老年亲代开始重视与外嫁女儿保持良好的关系，大多数已婚妇女也与娘家保持日益密切的关系，已婚女儿不再被当做是泼出去的水（张卫国, 2011）³⁰⁹⁻³¹⁰。

最后是空间视角。以往空间视角的介入更多是对城市问题的研究（勒菲弗, 2008）⁹。而之所以在农村代际关系研究中开始引入空间视角，是因为城市化过程中越来越的子代外出劳动移民，导致原有的家庭结构中增加了空间色彩。国内研究中，林蔼云（2006）首次将空间理论引用到移民家庭研究中，利用“漂泊空间”的概念分析福建晋江移民如何在迁入地香港和原有家庭不同的文化机制下重塑家庭空间。对于劳动移民对农村的影响，虽然没有直接的空间理论的提及，但是处处体现着空间色彩。潘鸿雁（2008）¹¹²将空间上长久分离、家庭实质上完整的家庭称为“非常规核心家庭”，并认为这是农民适应外出打工策略的一种主动选择行为。而金一虹（2010）¹⁶³则指出传统的家庭父权制并没有在城乡流动过程中消亡，而是进行了延续和重构，因为这是农民在城市边缘地带低成本生存的最有效率的家庭模式。空间视角的重要性将越来越突出，但是因为不是本文的重点，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不会大幅运用，只是在第五章分析代际亲情关系维持时，简单讨论一下子代移民对代际关系维持机制的影响。总之，上述三种视角与代际关系直接相关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和代际团结理论相互交织，呈现出多样复杂的代际关系形态，影响子代对老年亲代的养老支持。

2.2 主要发现与争论

2.2.1 家庭结构变迁与代际失衡

家庭结构（亲子间的居住距离）是代际关系团结理论的重要指标之一

(Silverstein et al, 1997)⁴³², 而且也是早期家庭现代化理论判断家庭现代化与否的主要依据。不少研究已经证明家庭结构影响养老行为的实践, 基于全国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指出老人的居住模式和亲子居住距离虽然不会显著影响子代的经济支持, 但会影响在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的支持(谢桂华, 2009); 基于河北保定调查数据的研究也指出共同居住的安排下子代提供家务照料、精神支持和情感体贴的可能性最大(鄢盛明 等, 2001)。通过五普数据和历史数据的分析, 王跃生指出, 虽然在农村三代直系家庭在近期有一定增长, 但也仅占 20%, 更多是单人家庭和核心家庭, 而且隔代家庭比例的增长在农村最为明显(王跃生, 2006)。这种家庭结构的变迁似乎会导致养老功能的降低, 尤其是考虑到家庭的核心化和子代劳动移民导致的越来越多的亲子空间分离。

但是随着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研究的转移, 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 家庭结构变迁不一定伴随家庭功能的衰弱。阎云翔对农村分家的研究(1998)⁸⁴比较具有代表性。他指出越来越多的农民提前分家, 选择一种“净身出户”为特点的分家模式。这种分家一方面鼓励了市场经济条件下, 个人财产观念的发展; 另一面也因为子代核心家庭脆弱性, 保持了与母家庭的相互依附与紧密联系, 阎云翔称之为“网络家庭”。仅从家庭结构看, 这确实是大家庭的衰弱, 但是从家庭成员角度看, 这是解决家庭问题的良方, 而不是家庭政治危机或伦理的失败。徐晓锋(2010)⁵⁹则通过口述史分析, 发现家庭结构变迁更多是为了家庭整体利益的考虑, 或者说是在特殊时期的生存策略, 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兴起。每个历史时期的家庭生命周期中, 家庭都在相应做出最符合家庭成员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家庭结构安排。裴晓梅等(Pei et al, 2010)²⁸的研究也指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当有稳定收入的时候选择与子女分开居住在同一社区。这种模式并没有使老人脱离大家庭, 反而促进了代际和谐。家庭结构变迁与家庭功能衰弱的假说在城市也不一定正确, 比如许琪(2013)¹¹¹就发现在城市, 子女需要已经变成亲子同住的重要原因, 这种需求体现在住房上的依赖与照料孙代任务上的分担。

回到农村, 在子代劳动移民对代际关系影响的研究中, 郭曼等(Guo et al, 2012)发现, 当利用代际团结模型中的指标分析中国安徽地区的农村家庭时, 亲代与外出打工子代的关系呈现了一种在西方家庭中找不到的类型, 文中称之为“距离递增型(distant ascending)”, 意思是距离越远, 关系反而更加密切, 获得更多支持。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证明代际结构的变迁并没有导致代际平衡的打破, 代际关系在用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维持其平衡。所以, 笔者认为家庭结构变迁对于代际失衡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 我们更关心的是这种家庭结构变迁背后的原因及代际间的具体交换内容。

2.2.2 代际交换关系中的失衡

代际交换是代际失衡问题最核心的和也是直接的领域。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 2006)在《老龄化和社会科学手册》中总结了目前代际交换研究的主要进展。社会情境中的代际交换研究主要讨论三个层次的代际关系：1) 目前讨论最多的就是家庭作为代际个体互动的社会系统，主要讨论代际交换背后的逻辑与动机；2) 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制度背景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3) 代际交换背后的文化取向，这也是代际关系中的“交换”与市场关系中的“交换”的重要差异。本文讨论的无疑是其中的第一层代际交换。

不过国内过去的讨论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代际经济交换，很少关注亲代的情感需求和代际交换背后的情感关系的驱动性。在这种背景下，大部分研究的通常思路是亲代的经济投资没有换回子代的经济回馈，进而认为这是代际失衡，从而得出诸如“孝道衰竭”的结论。其实，代际交换关系是彼此心理感知的关系，而不是完全物质形态或可精确测量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贯穿生命历程的关系，呈现此有彼无的特征(王跃生, 2008)¹⁸。郭于华研究(2011)²⁷⁷中对于代际交换公平逻辑的讨论给我们很多启发，她认为所谓公平与否更多是当事人心理感受和群体成员的社会评价。所以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代际间功能关系的失衡的时候，其背后隐藏的代际情感关系的失衡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前面提到的代际互动的利他动机的理想型假说，虽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当中的复杂形态，但是其对代际经济交换中所形成的代际亲密关系维持的重要性及对于维持代际平衡的作用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当农村老年亲代固守哺育-反哺传统，要求子代无条件回报的时候，子代的逻辑已经改变，开始关注生养以外的交换资源(郭于华, 2011)²⁸¹⁻²⁸²，结果是亲代成了子代的负担，代际关系成了一种工具性关系，而这种条件下的代际平衡其实非常危险，尤其在当下缺乏有效道德、舆论、地方性共识的时候。如何能够保障“代际契约”的履行，贝克尔认为是通过对子女尽力的投资来给子女灌输以负罪感和孝道感情(filial love)(Becker, 1992)⁴⁹⁻⁵⁰。而陈皆明(2010)也认为亲代应该投入大量家庭资源以建立强有力的亲子关系，淡化关系中的利益因素来保证代际关系的长久性。

在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上面提到的代际交换的公平(郭于华, 2011)与本文讨论的代际交换的平衡间的区别与联系。笔者认为平衡是一种状态，公平则是状态背后的原因，郭于华文章(2011)²⁸¹⁻²⁸²讨论公平是基于田野中观察到的不平衡的状态作为一种前提，是对某方面代际不平衡状态的解释，发现背后的问题是源于两代人对交换理解的差异。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代际失衡的多维度视角，而其背后失衡的原因，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解释。所以研究代际失衡问题，终究

要回到代际交换中的失衡，而这种失衡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功能交换的失衡，还需要更多关注其背后交换逻辑和交换内容的变化，尤其是代际关系与养老行为的研究中，我们虽然关心亲子间投资-赡养行为的平衡，但同时我们更关心代际间功能-情感关系的平衡。

2.2.3 家庭观念变迁与代际失衡

哈雷雯认为当前老年人面临的变迁所带来的问题，主要不是由于家庭结构或居住模式安排的变化，而是家庭功能的转型和支配家庭关系的价值观的变化（Hareven, 1994）⁴⁵⁵。而在中国，因为有传统家庭“孝”观念的存在，家庭观念的变迁显得更加突出。阎云翔（2006）²⁰²⁻²⁰⁷认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孝道在中国乡村经历了衰弱的过程，这既包含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批判父权为代表的“孝道的世俗化”过程，也包括后来市场经济改革中引入的价值观对孝道的挑战。对于目前的农村养老现状，阎云翔描述为“无效的法律和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因为一方面在主导型意识形态的连续性背景下，支撑传统孝道的文化和社会基础逐渐瓦解，另一方面，因为建设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国家动力不足，人们的晚年生活资源不得不依赖传统的家庭机制输送。其他的一些研究也指出家庭观念的变迁似乎朝着不利于老年人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代际关系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失衡（贺雪峰, 2008, 孟宪范, 2008）。

然而，也有研究反对“孝道衰竭”的论调，认为年轻一代对孝和家庭义务的理解与父母一代非常接近，而这种理解和支持可以保证父母在年老的时候得到家庭支持（刘爱玉, 2000），而另一项基于东亚四个地区的调查数据研究也指出家庭凝聚力具有强大的抗逆性，深厚的文化积淀超越了现代化的作用（杨菊华 等, 2009）⁴⁹。当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指出传统家庭观念并非衰竭，而是在社会变迁中改变和重构（Luo et al, 2012）。这种重构，可以概括为两个特点。一是亲子主轴的变化。对于现代家庭关系的特点，沈奕斐（2013）描述其为“个体家庭（iFamily）”，表示个体成了家庭的重心，形塑家庭的面貌，而这种个体在代际关系上更多是以子代为中心的个体，亲代家庭服从子代家庭的需求。二是亲代养老期待的变化，包含子代性别期待的变化和子代回馈形式的变化。谢宇等（Xie et al, 2009）对城市家庭数据的分析指出女儿对老年亲代的支持并不比儿子少，甚至更多，这是因为随着对亲代的经济支持不再是必不可少的选项，传统的家庭性别规范逐渐被打破。而唐灿等（2009）基于农村的调查也指出女儿赡养的重要性，如果说儿子赡养的动力来自责任的话，女儿赡养的动力则来自情感。另外，罗根等（Logan et al, 2003）将子代的支持区分为“仪式性赠与”和“分配性赠与”来理

解“孝”在当代家庭的意涵。从本文角度来说，孝不仅仅是一种子代在代际功能关系上的反哺，更应该是内心深处的亲情关系的认同，从这一点上来说，阎云翔对孝道衰竭的解释（阎云翔, 2006）²⁰⁸又有道理，他认为真正令老一代人气愤与失望的是孝道在情感和道德方面的衰弱，孝道的没落是一种情感性危机。

具体到代际失衡问题的解释，有研究认为是两代人观念上的差异，比如贺雪峰等（2012）认为之所在农村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代际失衡状态，是因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尚存，子代成家立业可以从精神上给予父母补充，而子代却不用承担任何实际的义务。杨善华等（2004）则通过“责任伦理”的概念给客观存在的代际失衡以合理性，认为老年亲代对子代不计回报的付出是建立家庭养老现实可行性的基础，这一点似乎又与代际互动的利他假说不谋而合。对于争论颇多的家庭观念变迁，在定量研究中很难衡量，更多的只能用行为去推导观念。所以这种价值观念的讨论超出了本文范畴，本文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只是把家庭观念变迁作为一种背景来讨论，而不会具体去试着得出关于文化或价值相关的结论。

2.2.4 多代关系与代际失衡

代际关系研究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维度是多代关系（具体体现为隔代照料功能）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对于多代家庭研究，起初是源于城市家庭研究，被认为是亲代为了减轻子代在现代社会市场竞争的压力而做出的牺牲与帮助。而随着80年代以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隔代照料及隔代家庭在农村越来越普遍，对子代外出务工的亲代老人来说，照料孙代是其普遍面临的问题。

对于多代关系对代际关系的意义有几种解释。第一种是互惠说，亲代通过对孙代照料时间上的投入换回子代经济上的回馈，这对有女儿的亲代更为明显。对山东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丈夫亲代获得子代家庭支持的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亲代的需求，而妻子亲代则是通过照料孙代、家务等方面的付出获得（Yang, 1996）。第二是权力说，认为隔代照料为老年亲代提供了和子代“协商”的权力，通过孙代就养老资源的获得与子代“议价”（Cong et al, 2011）。还有一种观点是利他说或者是家庭共同体说，意思是亲代通过照料孙代，向子代表现出一种对家庭团结的贡献，维持家庭共同体的一体性（Luo et al, 2012）⁸⁸。对全国代表性样本的数据分析就发现不管是从隔代照料的普遍性、隔代同住比例还是照料投入程度来说，中国在照料孙代方面的家庭代际团结程度都远高于西方国家（Chen et al, 2011）。

当大部分农村代际关系研究都普遍认为代际失衡，家庭养老功能衰弱的时候，似乎只有隔代照料能够换回子代有效的养老回馈。某种程度上，孙代成了没有财产积累的当前农村亲代和子代议价的唯一的“砝码”，也是弥补当前代际关系失衡

的有效工具。而随着老年人预期生命的增长，多代关系对代际关系重要性也将越来越重要，代际失衡问题似乎也可以从多代关系中寻找解答的途径。

2.3 述评：代际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对于已有的对于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在如下两个方面存在更多研究的潜力，进而去理解和解决目前的代际失衡问题。

一是，关注城乡代际关系研究中的巨大差别，在分析视角和方法上应该有侧重。在关系的内容上，城市中子代的实质性养老责任逐渐被形式养老所取代（王跃生, 2012），经济支持问题越来越不重要，甚至成为一种代际间的象征性交换（Xie et al, 2009）。而在农村，因为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尚需时日，子代经济支持依然重要，但同时又有大量老年亲代，虽然被赡养，但远远谈不上善待（郭于华, 2011）。所以代际失衡在城乡有着巨大的差别。另外，在研究方法上城市代际关系和农村代际关系的研究呈现两种不同的态势，前者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后者则是基于村庄的田野调查。本特森（Bengtson, 2001）¹² 对代际关系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分工做过解释，认为集中在典型家庭的深入的定性研究可以生产（generate）出更多新的假设，然后基于大型调查数据去验证假设的普遍性。目前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诸多定性研究给我们描绘了中国各地村庄中的家庭养老情形，讲述了复杂而多样的代际“失衡”（陈柏峰, 2009, 范成杰, 2009, 郭于华, 2011, 贺雪峰, 2008, 刘晋飞, 2012, 刘岩, 2010）或“平衡”（贺雪峰, 2009, 朱静辉 等 2013）的图景，本文要做的就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涵盖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数据去验证和展开失衡背后的故事，为进一步推进这个领域的研究作出贡献。

二是，关注代际关系问题的复杂性和老年群体需求的多样性。关注农村代际关系与养老行为，我们不能仅仅利用经济指标去认识和评价代际失衡，所以本文对于代际失衡的定义采用较为开放的态度，试着以一种多元化的视角去理解。笔者认为贺雪峰（2009）对全国不同地区农村代际关系的讨论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本文的数据也是由 3 个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省份的 19 个农村构成，相信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过去研究中对农村代际关系多样性关注的不足。另外，过去的研究缺乏对老年群体的多元需求的关注。王萍等（2011）的研究是为数不多的关注子代情感支持的尝试，他们发现相比经济、照料支持对老人产生的可能正面可能负面的不确定的影响，情感支持肯定老人的存在价值，在心理、生理健康的影响上是恒定的。所以本文也将关注子代支持的非金钱面向。

第3章 研究设计

3.1 分析框架与问题假设

结合第2章的文献综述，具体到本文的研究问题，即农村老年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行为，本文的分析框架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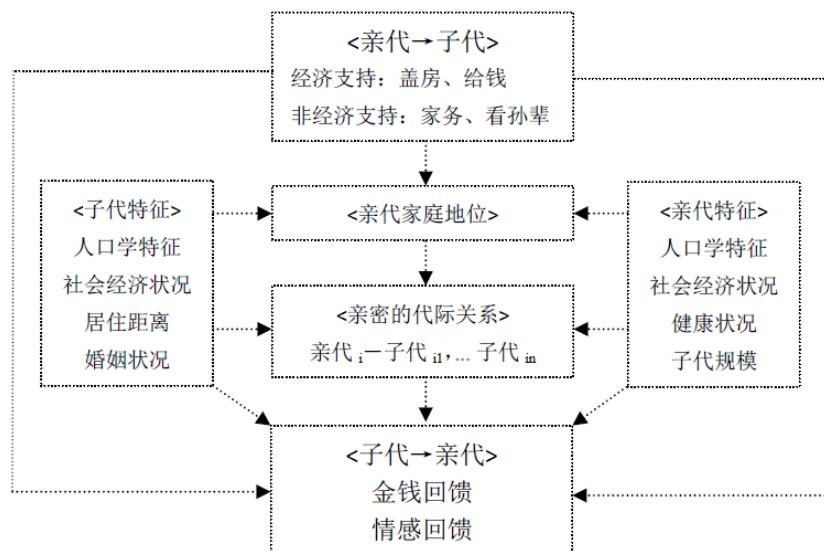


图 3.1 农村老年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行为的分析框架图

上图中，所有的箭头表示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而且虚线表示这种关系根据具体的情形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结合上图，我们研究的代际失衡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1) 亲代对子代的投资有没有直接产生子代的各类回馈（纯交换关系）？2) 亲代对子代的投资是不是通过影响亲代家庭地位，进而产生获得子代回馈可能性上的差异？3) 亲代对子代的支持是不是有助于维持亲密关系，进而转化为子代各类回馈？结合上述分析框架和已有理论，本文提出如下五个假设：

假设 1. 根据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家庭的变迁逐渐淡化亲子间的代际情感关系，从而导致亲代对子代的投资仅仅根据市场化的交换逻辑得到子代回馈，而不是基于亲密关系或其他要素（上图中直接从投资到赡养）。

假设 2. 根据家庭团结的理想模型，亲代对子代的投资首先有利于维持“潜在的代际团结”，即亲密关系，进而在亲代需要帮助的时候更能转化为“显著的代际

团结”，即养老行为。

假设 3. 根据代际互动的利他主义解释，亲代对子代的投资能够根据亲代的需求和子代的能力转化为实际的养老行为，但是不一定是基于亲密关系。

假设 4. 根据代际互动的议价权力解释，亲代对子代的投资在亲代家庭地位高的家庭中更能转化为实际的回馈。

假设 5. 根据代际互动的互惠解释，亲代对子代的投资既能维持一种亲密的代际关系，也能获得平衡的代际关系，但是对老年亲代的养老行为不是基于老人的需求，而是基于老人的付出情况。

上述假设可以认为是五种理论视角下提出的五种代际间“投资-赡养”平衡的不同可能性解释，再结合第 2 章表 2.1 对失衡与平衡的分类，我们接下来的部分将用数据去验证，农村老年家庭代际关系在各个维度上是失衡的还是平衡的，如果是平衡，其维持机制有哪些，而如果是失衡，则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最后通过平衡与失衡的总结，探讨保障农村老年人晚年多样需求的有效机制。

3. 2 数据与方法

3. 2. 1 数据介绍

本文的数据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老年学研究中心 2009 年在江苏、山东、山西，3 省 4 镇 19 村的问卷调查^①，问卷分为老年人问卷和村庄问卷，本文只用老年人问卷。调查采用分层多级抽样方法，原始数据是 795 个老年人样本。

本文是基于亲代受访者回答的数据，跟以往基于子代的样本相比，本文的数据更能反映亲代真实的想法和多元化的需求。另外，本文所使用数据的一个特点是不仅询问老年亲代跟子代间的各类互动，而且还对老年亲代询问每一名子代的社会经济特征、居住距离等具体信息及本文当中的一个重要因变量——亲密关系。本文根据研究需求，将数据中的一些分析变量缺失的样本和非成年子代样本剔除后，把数据分为两种类型样本进行分析。一是亲代样本，在保留原有分析变量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亲密子女数变量，进而分析亲代家庭养老获得的影响因素；二是亲-子配对样本，由于家庭养老其实是一种家庭内子代成员间的分工，加上目前的农村老人更多是在非计划生育时代生育，有多位子女，所以把所有子女包括进去的配对样本更能真实地反映目前农村的实际家庭养老状况。本文使用的样本量分别是 756 个亲代样本和 2630 个亲-子配对样本，样本量会根据不同的分析需求有不同程度的调整。

^① 调查接受英国发展研究所（IDS）“亚洲社会保障项目”资助，特此说明。

为了防止分析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本文将两组样本所共有的亲代特征和地域变量进行了比较（表 3.1），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差异。

表格中大部分变量在亲代样本和亲-子配对样本中的分布没有显著的差异，只有两个变量出现显著的差异，即亲代样本中的儿子和女儿数明显少于配对样本，而且亲代样本中儿子数更多，而配对样本中女儿数变得更多了，再此做简要说明。对其可能的解释是子代数多的亲代样本在配对样本中重复的次数更多，所以总体上配对样本的子女数要高于亲代样本。而女儿数和儿子数相对大小的变化则可能是因为子女多的家庭中，女儿比儿子多，这是源于农村家庭中儿子被认为是传宗接代的象征，如果前面几胎是女儿，会继续生育，直到儿子的诞生。为了慎重起见，本文在后面的回归分析中，仅在亲代样本的分析中使用子女数变量，在亲-子配对样本的分析中，不再使用这一变量（后者的分析中可能体现为兄弟姐妹数）。

表 3.1 亲代样本与亲子配对样本的比较

	亲代样本 (n=756)	亲-子配对样本 (n=2630)
亲代特征		
男性	44.44	43.61
年龄	71.44	72.73
配偶健在	65.07	61.68
收入（对数）	6.93	6.70
ADL ¹	1.13	1.22
儿子数	1.77	2.11
女儿数	1.72	2.14
地域分布比例		
山东	24.74	24.90
山西	50.26	58.21
江苏	25.00	16.88

说明：1—ADL 是健康指标的一种测量方式，在变量部分会有详细说明。

3.2.2 变量的测量

因变量

本文当中的因变量分为两部分：1) 子代对亲代的养老行为，分为过去一年子

代对亲代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具体问题分别为“过去一年您的子女是否经常为您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和“过去一年您的子女是否经常听您讲述您的心事或想法？”；2) 亲代对自己某位子代的关系亲密度评价，原始数据中是1-5的等级量表，本文根据分析需求，把数据处理为亲密或非亲密的二分变量。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子代特征、亲代特征、亲代对子代的支持和亲代家庭地位，所包含的具体变量如下：

1) 子代特征

子代特征由被访亲代报告，分为子代性别、子代年龄、子代经济条件和子代居住距离。而在分析亲代样本时，将考虑子女数（分为儿子数和女儿数）及根据配对样本中亲密关系所重新定义的亲密子女数（分为亲密儿子数和亲密女儿数）。由于本文中的绝大部分子代都已完婚，故不考虑子代婚姻状况。

2) 亲代特征

亲代特征则具体包括亲代性别、亲代年龄、亲代配偶健在情况、亲代收入和亲代健康状况。亲代健康状况的测量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亲代健康自评；二是亲代去年是否存在卧病在床情况；三是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价（ADL），根据10个指标计算赋值1（能自理）或0（不能自理），得出1~10的分数，分数越高活动能力越差。

3) 亲代对子代的支持

亲代对子代的支持根据支持类型分为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其中经济支持分为日常经济支持（stream flow）和大宗财富转移（stock flow），前者主要是短期内的日常金钱转移，而后者在中国主要通过操办子女婚姻等重大事件时进行，且绝大多数在父母生前进行，其中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通过购置房子所进行的财产转移是最为普遍也是最重要的形式。本文将这种亲代大宗财富转移定义为“长时段（long-term）转移”，因为这既是一种亲代长时段积累的财富的转移，也包含着亲代对这种转移可能存在的长时段回报的期待。非经济支持主要通过过去一年亲代是否为子代提供生活照料和照看孙代支持来衡量。

4) 亲代家庭地位

根据代际互动的权力动机假说，亲代家庭地位是亲代能够在晚年获得稳定的子代支持重要保障，尤其在农村，这种传统家长权威的作用更加明显。本文根据实际问卷中的问题设置，通过两个变量来间接测量亲代家庭地位。一是亲代在家庭代际关系中的权威，通过亲代回答的“在孩子面前说话管不管用”的问题来测量，为二分变量；二是亲代在子代家庭决策中的参与度，通过询问亲代“孩子有

问题会不会找您商量”的问题来测量，也为二分变量。

3.2.3 分析方法

本文的数据分析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从亲代视角的代际关系状况描述，分析老年亲代对子代多维度的支持、亲代与子代情感关系的维持及亲代家庭地位的变化，主要是比较不同年龄群体老年人之间的差异和其中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第二步是着重于子代对亲代的各类回馈，使用回归方法分析解释变量的影响机制。最后是亲-子间亲密关系维持的影响机制分析，解释变量与第二步类似，不过同一个家庭的亲代共享同一亲代特征。

在上述步骤中，第二步和第三部根据因变量的特征分别使用普通二项逻辑斯蒂回归和多层次逻辑斯蒂回归。首先是普通二项逻辑斯蒂回归。设第 i 个人成功的概率为 p_i ，本文中表示第 i 个亲代获得子代经济和情感支持的概率。 K 表示自变量总数， k 表示 K 个自变量中的第 k 个变量，故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表达为：

$$\text{logit}(p_i) = \log\left(\frac{p_i}{1-p_i}\right) = \sum_{k=0}^K \beta_k x_{ik}$$

其次是二分类数据多层次模型。这里的研究对象是家庭内的一对亲-子关系，故同一个家庭中的多对亲子关系间是不独立的，要引入家庭层次的分析，本文根据研究需求使用多层次模型中的随机截距模型，其一般表达式为（引自 Powers et al, 2008）：

$$\text{logit}(p_{ij}) = \beta_{0i} + \beta_1 z_{ij}$$

$$\beta_{0i} = \beta_{00} + \beta_{01} x_i + u_i$$

上表中 i 同样表示第 i 个亲代，不过这次加入了子代样本，所以 p_{ij} 代表第 i 个亲代与第 j 个子代关系亲密的概率。本文当中的统计分析部分均用 STATA12 软件完成。

第4章 农村老年家庭代际关系现状：亲代视角

4.1 代际功能关系

在这一章，我们将从老年亲代视角看家庭代际层面的各个维度，包括代际功能维度、代际情感维度和代际权力维度的现状。首先是代际功能关系，也就是老年亲代在家庭周期各个阶段对子代的各类支持，可以算是亲代对子代的一种养老投资。本文将从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两个角度进行讨论。经济支持又根据性质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如在第三章所述，之所以将为子代盖房成为长期投资，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支持需要长期财产积累，另一方面这种投资也包含长时段回报的期待。非经济支持分为生活照料（用过去一年为子代经常做家务与否测量）和帮助子代照看孙子女。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4.1。

表 4.1 亲代对子代的各类功能性支持

亲代功能性支持	样本量	百分比	测量方法
亲代经济支持			
长期投资：给子代盖房	470	65.92	1=出钱给子代盖房 0=没有盖房
短期投资：日常经济支持	144	19.05	1=过去一年给孩子钱 0=没有给钱
亲代非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	234	30.95	1=过去一年经常为孩子做家务 0=没有做家务
照看孙代	242	32.01	1=过去一年照看孙代 0=没有照看

上表中，我们看到将近七成的老年亲代为子代出钱盖过房子，与以往研究的结果类似（如王跃生 等, 2011），展现出了农村家庭大宗财富转移通过子代结婚时期的房产转移这种传统模式在当下的普遍性。而由于没有财产积累，老年亲代在晚年基本没有经济能力继续为子代提供经济支持，所以过去一年给子代经济支持

的比例只有 19%。虽然老年亲代在经济能力上有限，但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依然为子代提供各类非经济支持，在为子代做家务和照看孙代的比例都超过 30%。如果计算至少提供过一项非经济支持的比例，则为 45.8%，与 CFPS 全国调查数据中的农村亲代非经济支持比例 47.9%（许琪 等, 2013）非常接近。

由于不同年龄亲代在代际支持观念、支持能力上可能有较大差距，同时考虑到可以通过年龄群体的划分间接分析代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所以接下来的代际关系分析中将会对不同年龄群体进行比较，在这里先看一下功能关系上的随年龄变化的趋势，结果如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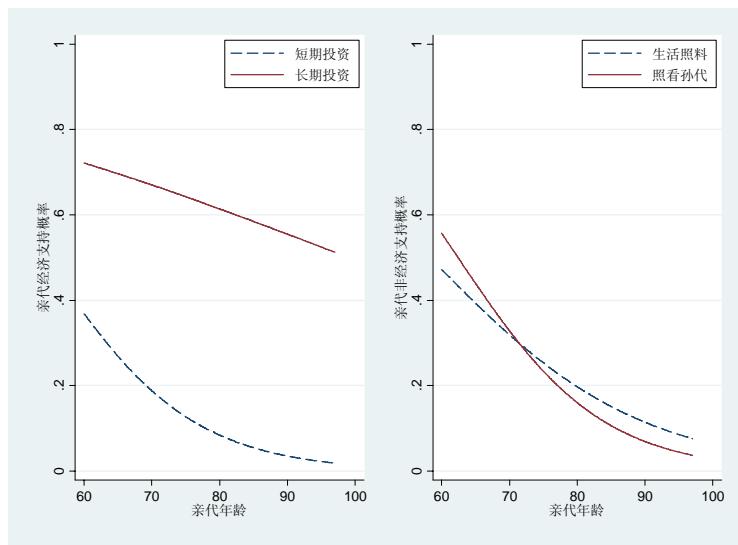


图 4.1 亲代代际功能性支持概率随年龄变化的趋势图

上图中的左半部分是亲代提供的经济支持，右半部分是非经济支持，分别表示这些支持的概率随亲代年龄变化的趋势。我们看到年轻的老人亲代相比年长亲代，更可能为子代进行长期投资，即盖房，但差别不是很大，且比例均高于 50%。而近期内的亲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不同年龄段的亲代差别较大。60 岁左右的老人亲代中依然有 30% 左右的人为子代在过去一年提供经济支持，而这一比例在 80 岁以上的老人亲代中低于 10%。可以看出，在亲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方面，刚刚进入老年阶段的较为年轻的亲代在大宗财富支持和日常经济支持方面都对相比年长亲代付出了更多。

图 4.1 的右半部分是非经济支持的随年龄变化的趋势。与经济支持类似，有高比例（约 50%）的相对年轻的老人亲代为子代提供生活照料和照看孙代的服务。年老的亲代中为子代提供生活照料服务的比例高于照看孙代，但是两者差别不大。相比生活照料，照看孙代的服务受亲代年龄的影响较大，老人亲代在自己还尚未

年老失去自理能力的时候承担照看孙代的任务。

综上所述，不管是在经济支持，还是在非经济支持方面，农村老年亲代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为子代服务，其中较为年轻的亲代为子代的付出远远高于年长亲代，这可以理解为一种亲代为子代付出日益增长的趋势，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老年亲代支持子代的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表现，包括经济能力和照料提供能力的下降。而这种亲代在代际功能关系上的付出，有没有帮助亲代与子代保持一种亲密的代际关系？下文将继续讨论代际情感关系。

4.2 代际情感关系

这一部分根据亲子配对数据中的亲代对每一位子女的代际关系评价分析代际间的情感关系，抑或亲密程度。代际间的情感关系本文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亲密关系，表示亲代认为与某子代的关系很好；冲突关系，表示亲代与子代关系不好；还有就是既非亲密、又非冲突的关系，本文称为非亲密关系。整体上来看，农村的老年亲代能与自己的亲生子代在晚年保持亲密关系的比例不到一半，仅为46%。如果根据亲代和子代不同性别去重新划分的话，亲密关系的分布结果如下：

表 4.2 不同性别亲子配对的代际亲密关系比较

不同亲子配对	亲密关系	非亲密关系	冲突关系	合计
	样本量 (百分比)	样本量 (百分比)	样本量 (百分比)	
父亲-儿子	227 (39.96)	233 (41.02)	108 (19.01)	568 (100)
父亲-女儿	263 (45.74)	244 (42.43)	68 (11.83)	575 (100)
母亲-儿子	362 (47.69)	264 (34.78)	133 (17.52)	759 (100)
母亲-女儿	352 (49.03)	271 (37.74)	95 (13.23)	718 (100)
合计	1204	1012	404	2620

表 4.2 中，我们可以大体看到代际亲密关系上的性别差异。总的来说，母亲相比父亲，更可能与子代维持亲密的代际关系；儿子相比女儿更可能与老年亲代陷

入冲突关系，而更少的保持亲密关系。四种按照性别分配的代际关系配对中，相对最为和谐的是“父亲-女儿”关系和“母亲-女儿”关系，因为他们较少冲突，较多亲密。这与目前农村代际关系研究中越来越强调女儿作用的观点相符（比如张卫国，2011），而且也部分证实了“女儿养父母是情分，儿子养父母是名分”的已有农村研究结论（唐灿 等, 2009）²²。当然，我们也要关注冲突关系中，儿子显著高于女儿的现状，因为毕竟在目前，儿子还被认为是农村老年亲代依靠的主要来源，也被认为是赡养义务的主要承担者，如何能够改善与儿子的关系对于老年亲代的养老保障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传统“养儿防老”的意识下，多子多福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养老保障，而随着子代个体化意识的增强，家庭养老陷入一种困境，赡养关系成为一种工具性关系，导致代际亲密关系缺失，多子女并不一定带来更好的养老保障，相反更可能导致代际冲突。那么农村老年家庭的所有子代中亲密子代的比例在不同年龄群体的亲代间有哪些差别呢？图 4.2 对不同性别子代数和不同性别亲密子代数进行了比较，并分析随亲代年龄增长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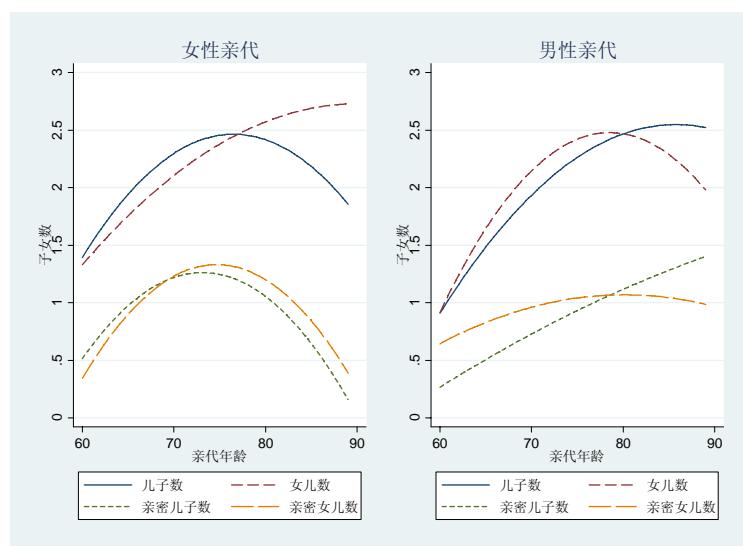


图 4.2 亲代儿女数和亲密关系儿女数随亲代年龄的变化

这里要说明的是，年龄和子女数（包括总子女数和亲密子女数）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故在作图时使用非线性方程。在上图中，男性亲代和女性亲代在儿子数和女儿数的总量上差别不大，但是在亲密关系的维持上有较大差异。女性亲代的亲密儿子和亲密女儿数量随年龄变化的趋势相差不大，但考虑到亲密儿子数在晚年的减少更可能是因为儿子总数的减少，亲密女儿数量的减少不是由于女儿数量的减少，说明较年轻的女性亲代开始注重与女儿亲密关系的维持，其

程度跟儿子无差异。男性亲代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较年长的老年亲代儿子数量有所减少，但是亲密儿子的数量则是逐步增加，父子关系有缓和的趋势。而父女关系则是在较年轻的老年亲代群体维持的最好，较年轻老年亲代的父女关系甚至远远好于母女关系，这与传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论断差别很大，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的意识中传统的父权制下父亲对儿子的重视。

4.3 亲代家庭地位

最后是亲代家庭地位的变化。本文利用两个变量，亲代权威，即孩子面前说话管不管用，和亲代家庭决策参与度，即孩子有问题会不会找亲代商量，来进行分析。对于家庭养老功能衰退的一个重要解释是亲代权力的丧失和子代权力的上升。亲代权力上升的一个特征是亲代在家庭话语权的丧失和家庭决策参与上的亲代家庭与子代家庭的分离。从图 4.3 中我们可以看到，约 50% 的亲代报告在子代面前有话语权，而且这在较年长子代和年轻子代间差别不大。而家庭决策的参与上，40~50% 的年轻老年亲代觉得子代在有问题时会及时找自己商量，而这在年长亲代群体仅占 20% 左右，说明更多年轻的老人亲代愿意参与到子代家庭的决策当中，保持代际间的频繁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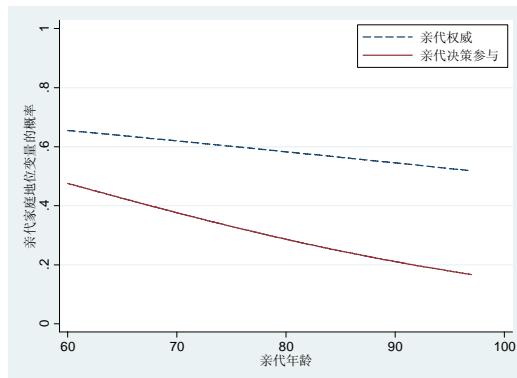


图 4.3 亲代家庭地位随年龄变化图

代际失衡的一个解释是亲代权力地位的下降，其逻辑是子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多地依靠家庭外非农业的途径获得收入，逐渐摆脱母家庭的经济控制，从而导致在与亲代的互动中更有权力。其隐含的背景是子代的经济状况逐渐摆脱与亲代家庭的联系，子代的经济状况与亲代的关联性下降。为了验证这一点，本文根据亲代评价的子代经济状况和亲代的各项经济指标，绘制了表格 4.3。

表 4.3 中，不管是亲代年总收入，还是亲代无收入的比例上，都与子代的经济状况有着显著的相关性 ($p < .05$)。表中子女经济状况好的亲代，他们的收入显著高

于子女经济状况较差的亲代。而在亲代无收入的比例上，经济状况好的子代的亲代中，仅有 7.95% 是没有收入的，这个数字在经济状况差的子代中高达 21.4%，也明显高于平均水平（13.25%）。从上述分析中，我们至少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子代家庭与亲代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完全脱离的，其中涉及的具体的养老行为，则在后文中讨论。而在老年亲代家庭每月期待收入这一项上，本文却发现不同经济状况子代的亲代身上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一结果不得不让我们怀疑亲代期待收入和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是由于子代赡养能力的差距（或者我们称之为结构性失衡）所致。

表 4.3 不同子代经济状况的亲代收入比较

子代经济状况	年总收入	无收入的比例	月期待收入
	对数平均 (标准差)	百分比	对数平均 (标准差)
很好/较好	7.29 (2.45)	7.95	5.53 (1.19)
一般	6.58 (2.92)	14.25	5.51 (1.00)
较差/很差	5.90 (3.26)	21.40	5.54 (0.89)
合计	6.71*	13.25*	5.52

* $p < .05$ （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检验）

4.4 本章小结

本章是对接下来两章代际失衡分析的一个背景介绍和铺垫，只有从亲代角度分析代际功能关系、情感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变化，我们才能更好地看到老年家庭代际关系的全貌，为接下来具体分析子代回馈，进而讨论代际失衡问题提供一个更加准确的线索。本章的结论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在代际功能关系上，老年亲代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都付出了很多。不管在大宗财富转移上，还是非经济支持上，都有很高比例的老年亲代在尽力为子代服务。而在短期经济支持这一项上，虽然整体上看相对较少，但是如果根据亲代年龄看其趋势的话，我们也可以发现较为年轻的老年亲代中其比例依然很大，这也与不同年龄亲代因为历史原因在财产积累上的差距有关。而且不仅在短期经

济支持上，其他支持包括家庭照料和孙代照看服务上，较年轻的老年亲代对子女的付出都远远多于年老的亲代。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代际功能关系上老年亲代为子代的付出越来越多的一种趋势。

在代际情感关系上，整体上仅有不到一半的子女与其亲代保持着能够称得上亲密的关系，其中的性别差异也较为明显。具体来讲，父女关系和母女关系在情感上相比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有着较多亲密和较少冲突。而从亲代年龄趋势上看，较为年轻的亲代都更为关注与女儿的亲密关系，而晚年母女关系的亲密度最低。相对来说，晚年父子关系有缓和的趋势，而且年轻的老年父亲和女儿的亲密关系程度也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亲子关系。

在代际权力关系上，本章分析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并使用家庭权威和家庭决策参与度两个指标去分析。本文发现不管在哪一年龄群体，亲代家庭权威犹存的比例大概维持在 50% 左右，而亲代在子代家庭决策的参与上随年龄的增加呈下降趋势，较年轻的老年亲代更多地参与到子代家庭的决策当中。而在亲子家庭间的收入相关性上，并没有像代际关系理论中的亲代权力衰弱假说预测的那样有下降的趋势，反而是高度相关。相反，在亲代期待收入上，不同经济状况子代的亲代间没有显著差异，反映了亲代的经济需求并没有随着子代的经济状况而有变化。这提醒我们，养老失衡存在子代“结构性”失衡的可能性，即子代经济条件上的差异导致老年人保障获得上的不平等。

从亲代角度分析家庭代际间的各类关系之后，我们就要问代际间的如此复杂多样的互动是如何影响老年人晚年多样化支持的获得？其影响机制如何？换句话说，老年亲代对子代的各种支持是否能够换回子代的必然回馈，进而维持理想的平衡类型？这是本文接下来两章要讨论的问题。

第5章 代际关系与养老行为

5.1 代际关系与子代经济支持

本章分析代际关系对具体养老行为的解释，是基于亲代样本的分析。首先是已有研究中最为普遍的子代对老年亲代的经济支持。样本中约有 546 位老年人在过去一年获得了子代金钱上的帮助，约占总量的 72%，高于全国调查数据的 49.9%（许琪 等, 2013）。在进行因果分析之前看一下主要解释变量与子代经济支持行为间的交互表及显著度检验（表 5.1）。

表 5.1 主要解释变量在与子代经济支持

	获得子代经 济支持 (n=546)	不能获得子 代经济支持 (n=210)	显著度
子代情况			
儿子数	1.87	1.55	*
女儿数	1.88	1.37	*
亲密儿子数	0.85	0.62	*
亲密女儿数	0.87	0.65	*
对子代投资情况			
给予子代盖新房	66.67	63.92	ns
日常经济支持	15.20	29.05	*
日常生活照料	27.47	40.00	*
照看孙代	32.05	31.90	ns
亲代特征			
男性	41.21	52.86	*
配偶健在	61.44	74.52	*
收入对数	6.64	7.67	*
亲代家庭地位			
亲代权威强	65.14	51.67	*

决策参与度高	36.03	38.10	ns
--------	-------	-------	----

* $p < .05$ (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或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检验)

上表中，子女数及亲密子女数在获得子代经济支持和不能获得支持的群体间的差异是显著的，在四组变量上都是前者高于后者，似乎子女更多的亲代、或者是其中亲密子女更多的亲代更有可能获得经济支持。而对子代的投资情况上，没有获得子代经济支持的老年亲代过去一年更有可能给予子代以经济和生活上的帮助，而在住房转移和孙代照看行为没有显著差异。亲代特征变量上，没有获得经济支持的老人中男性、配偶健在、收入高的人群显著更多，而亲代权威强的老人更可能获得经济支持，家庭决策参与变量则不显著。

表 5.2 子代经济支持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比率比）

	模型 1: 子代情况	模型 2: 亲代特征	模型 3: 亲代投资	模型 4: 亲代地位
截距	0.82	2.69**	4.10***	2.72*
子代情况				
儿子数	1.33**	1.27**	1.13	1.18 [†]
女儿数	1.47***	1.54***	1.42***	1.43***
亲密儿子数	1.17	1.13	1.17	1.08
亲密女儿数	0.93	0.87	0.84	0.84
亲代特征				
男性		0.66*	0.57**	0.56**
配偶健在		0.75 [†]	0.75 [†]	0.70 [†]
收入（对数）		0.90*	0.90**	0.90*
亲代投资				
给予子代盖新房			1.36 [†]	1.39 [†]
日常经济支持			0.66 [†]	0.63*

日常生活照料		0.55**	0.55**
照看孙代		1.57*	1.55*
亲代家庭地位			
亲代权威强			1.89**
决策参与度高			1.21
Log L	-425.59	-379.36	-346.80
伪 R 方	0.05	0.08	0.10
	0.11		

! <0.1 *p<0.05 **p<0.01 ***p<0.001

根据上述变量进行模型分析，结果在表 5.2 中呈现，给出的数据形式是比率比（Odd Ratio），四个模型依次加入子代情况、亲代特征、亲代投资和亲代地位变量组。首先在子代情况上，只有子女数，尤其是女儿数量，而非亲密的子女数，显著影响亲代经济支持的获得。每增加一个女儿，老年亲代获得经济支持的比率比增加 40% 左右，儿子的作用则只有 18%，且在加入亲代变量之后不太显著。亲代特征上，男性亲代获得经济支持的比率比只有女性亲代的一半多一点，而且收入越高越不可能获得经济支持，符合子代经济支持的需求假说。而亲代对子代的各项投资支持上，给子代以盖房形式的财产转移只在 0.1 的水平上显著，且有财富转移的子代，相比没有转移的子代在获得子代经济支持的比率比上高出 39%。照看孙代也使这个数字高出 50% 多，而日常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则减少了获得的可能性。最后的亲代家庭地位变量，只有亲代权威变量显著，且权威强的亲代获得子代经济支持的比率比高出 89%，而亲代家庭决策参与变量没有对亲代获得子代经济支持的概率产生显著影响。

从上述结果当中看到，传统的哺育-反哺模式至少在经济支持上是“平衡”的，多抚养子代确实更可能获得子代经济支持，而且是基于亲代的需求。但是其中的变化是，更可能是“养女防老”，而非“养儿防老”。女儿的作用在四个模型中都显著，且大于儿子的作用。而儿子的作用在引入亲代特征和亲代家庭地位变量之后就几乎不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儿子的作用更可能来自于和亲代的交换或亲代的权威，而女儿更可能来自情感。总体上，在子代经济赡养上，子女数量、亲代需求和亲代权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符合一种代际间的“义务型平衡”。

5.2 代际关系与子代情感支持

接下来是子代的非经济支持，本文选用情感支持，即过去一年子代是否经常

倾听亲代心事或想法来衡量。为了跟前面的经济支持进行对比，这里的大部分解释变量与前面一样，只是在亲代特征方面，为了验证子代支持是否是基于亲代需求这一假设，经济支持上选用的是亲代年收入变量，而情感支持上是选用去年是否卧病在床的健康指标。与前面类似，首先看一下解释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对比表 5.3 与表 5.1，最大的差别来自于子女情况变量组上。如果说在子代经济支持的获得上，既存子女数，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能增加子代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的话，在情感支持上，亲密子女数而非总子女数才是关键。此外在亲代投资上，结果与表 5.1 正好相反，给予子代日常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照看孙代服务的亲代的比例在获得子代情感支持的亲代中显著高于没有获得的亲代。而在亲代家庭地位变量上，获得子代情感支持的亲代中子代家庭决策参与度高的亲代比例高于没有获得情感支持的亲代，亲代权威变量则与经济支持的情况类似。亲代特征上，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去年有过伤病卧床经历的老年亲代在去年获得子代情感支持的老年人中的比例高于没有获得的亲代群体。

表 5.3 主要解释变量在与子代情感支持

	获得子代情感支持 (n=414)	不能获得子代情感支持 (n=341)	显著度
子代情况			
儿子数	1.76	1.77	ns
女儿数	1.66	1.80	ns
亲密儿子数	1.03	0.50	*
亲密女儿数	1.03	0.55	*
亲代投资			
给儿子盖新房	64.18	68.21	ns
日常经济支持	21.98	15.25	*
日常生活照料	35.02	26.10	*
照看孙代	35.75	27.57	*
亲代特征			
男性	43.48	45.45	ns
年龄	70.78	72.25	*
配偶健在	66.02	63.80	ns

去年伤病卧床	30.15	21.18	*
亲代家庭地位			
亲代权威强	69.73	51.18	*
决策参与度高	44.31	27.06	*

* $p < .05$ (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或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检验)

接下来是基于解释变量的模型分析（表 5.4）。结果显示，亲密儿子数和亲密女儿数都能显著提高获得子代情感支持的概率，而每多一名亲密的女儿，获得情感支持的比率比提高 47%，高于亲密儿子的 30%。去年有过卧病在床情况的亲代，也就是在情感支持上有需求的亲代，更可能获得情感支持。不过与经济支持的获得不同的是，亲代对子代的各项投资均对子代情感支持的提供没有显著影响。两项亲代家庭地位变量都对子代提供情感支持有着显著的影响，亲代权威越高，越有可能获得子代支持，家庭决策参与度的影响也是如此。

表 5.4 子代情感支持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比率比）

	模型 1: 子代情况	模型 2: 亲代特征	模型 3: 亲代投资	模型 4: 亲代地位
截距		9.14**	6.38 [†]	3.45
子代情况				
儿子数	0.86*	0.91	0.94	0.99
女儿数	0.78***	0.81**	0.80**	0.79**
亲密儿子数	1.44***	1.47***	1.40**	1.30**
亲密女儿数	1.40***	1.39***	1.45***	1.47***
亲代特征				
男性		1.00	0.98	0.97
配偶健在		0.97	0.98	0.91
年龄		0.97**	0.97*	0.98 [†]
卧病在床		1.70**	1.78**	1.76**

亲代投资				
给儿子盖新房		0.83	0.89	
日常经济支持		1.30	1.22	
日常生活照料		1.09	1.03	
照看孙代		1.11	1.10	
亲代家庭地位				
亲代权威强			1.52**	
决策参与度强			1.75**	
Log L	-484.49	-468.93	-438.82	-427.38
伪 R 方	0.07	0.08	0.09	0.11

! <0.1 *p<0.05 **p<0.01 ***p<0.001

总之，子代对亲代情感支持的提供上主要是根据一种需求原则和亲密的关系，符合“团结型平衡”。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相比亲代经济支持获得的普遍性（72%），获得情感支持的亲代比例仅占55%。同时，影响亲代情感支持获得的因素不是基于亲代的各项投资，而是亲密子女数和亲代家庭地位，所以为了维持情感支持关系上的平衡，老年亲代需要一方面提升自己在家中的权威和决策参与度，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和子代保持亲密的关系。而如何维持亲子间的亲密关系则是下一章要讨论的议题。

5.3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亲代获得子代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的影响因素分析，讨论代际间在功能关系上的平衡与失衡。通过分析，本章发现在亲代经济支持的获得上，虽然维持了一定的平衡，但更多是一种“义务型平衡”，而非“团结型平衡”，具体体现在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赡养上，更多是依靠传统的养老方式，即多抚养子女来增加获得赡养的可能性，而且亲代对子代的各类支持和投资得到了相应的经济上的回馈。同时子代的经济支持也是基于亲代的需求和亲代的家庭地位。但存在的问题是，这些养老行为更多是基于一种代际间的工具性关系，而非亲密关系，所以给老年人保障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

而在情感支持上，本文发现“失衡”与“平衡”并存。代际失衡体现在亲代获得的情感支持不是基于亲代对子代的各类投资，而是在与子代互动中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不管是亲密儿子数还是亲密女儿数都非常有效地保障亲代获得情感

支持的概率。所以在这一点上符合“团结型平衡”的代际关系，即相比抚养更多子代，与子女亲密关系的培养更有助于获得稳定的情感支持。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虽然保持了一种理想的代际平衡，仅有一半的老人能够获得子代情感上的慰藉，这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保障是一个潜在风险。

综上所述，同样是代际平衡，但在经济赡养和情感赡养上呈现了不同的特色。在农村社会变迁下的家庭养老，我们或许更希望看到的老年人赡养是源于一种子代情感上的驱使，而非仅仅是工具性的义务或理性的交换。但很遗憾，只有在子代的情感支持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亲子间亲密关系的作用，而情感支持获得比例又低于经济支持。同时考虑第四章中关于亲密关系在不同性别组合和年龄群体间的差异，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当前农村代际关系中急需增强的代际亲密关系究竟如何去维持？而当前的农村社会变迁背景又如何对传统代际关系产生影响？这将是下一章将要讨论的议题。

第6章 农村老年家庭代际亲密关系的维持

6.1 如何维持代际间的亲密关系？

本章讨论代际情感关系的维持。数据中仅有不到一半的农村老年家庭代际间维持着亲密关系，这给家庭养老行为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本章的目的就是要讨论代际关系中目前失衡比较严重的情感性亲密关系的维持机制，并分析农村社会变迁是否导致代际情感关系的疏离。本章的内容是基于亲-子配对数据的分析。

表 6.1 解释变量与代际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 (n=1142)	非亲密关系 (n=1380)	显著度
子代特征			
男性（百分比）	48.69	52.25	ns
年龄（岁）	44.80	44.69	ns
经济条件（1=好）	27.32	27.90	ns
居住距离（1=同居/同村）	54.38	61.01	*
亲代特征			
男性（百分比）	39.93	46.16	*
年龄（岁）	72.50	72.86	ns
配偶健在（百分比）	60.60	62.97	ns
日常活动能力评价	1.33	1.04	*
亲代投资			
给子代盖新房	65.15	67.39	ns
日常经济支持	18.65	12.83	*
日常生活照料	32.05	21.01	*
照看孙代	34.06	26.67	*
亲代家庭地位			

亲代权威强	70.93	51.52	*
决策参与度高	38.44	26.88	*

* $p < .05$ (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或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检验)

在进行模型分析之前，首先看一下亲密的亲子关系配对和非亲密的亲子关系配对在主要解释变量上的差别（结果见表 6.1）。子代特征上，非亲密关系中亲代和子代居住在同一屋檐下或同村的比例显著高于亲密关系，其他特征都没有显著差别。亲代特征变量上，用日常活动能力评价（ADL）测量的亲密关系亲代的健康状况略差于非亲密关系中的亲代。而亲代对子代的各种投资中，除了住房转移，其他三项在两个群体中都有显著差异。家庭地位变量在亲密关系和非亲密关系的配对中也均有显著差异。仅从上述表格中，我们似乎看到对子代投入多的、家庭地位高的亲代更能与其子代维持亲密的代际情感关系。接下来，建立回归模型以便验证上述变量对代际亲密关系的影响机制（结果见表 6.2）。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往的代际关系研究更多是家庭中某一位子代与亲代的代际关系分析，从而忽视家庭内其他兄弟姐妹与亲代的代际关系。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子代“不孝”或者代际关系衰竭的比例远远高于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家庭代际关系不是某一子代与亲代的关系，而是某一亲代对所有子代的一对多的关系。所以本文的分析中，在考虑家庭中所有子女的基础上，对来自同一家庭的子代进行控制，以减少回归分析中独立性假设造成的误差。为了和已有研究进行比较，本文也将一般模型和多层次模型的结果同时列出。表格中展示的是系数，主要是分析解释变量效应的正向或者负向的影响，而不重点看具体的影响程度。

先看一下表 6.2 的一般模型。结果显示，居住距离显著相关，而且是负值，说明相比外出移民的子代，和身边的子代更不可能是亲密关系。对子代的投资，除了住房转移外，都能显著提高代际间亲密关系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亲代投资有助于维持亲密关系。亲代家庭地位效应也是正向的。而且从一般模型的结果中，我们看到亲代与不同性别子代的亲密关系没有显著差异。似乎农村社会变迁中的代际亲密关系的维持在投资-赡养逻辑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且子代的各种形式的移民反而还强化了代际间的亲密度。

然而当我们控制住来自同一家庭的子代样本的时候，分析结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亲子间居住距离的效应从非常显著变为不显著，而且效应值几乎变为 0，说明一个家庭中，某一位子代离开父母并没有导致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显著变化。而亲代对子代的各类投资上，除了亲代对子代日常生活家务上的支持对亲密关系维持的作用依然显著外，其余的投资都失去了效应。亲代家庭地位的影响变大，

说明亲代家庭地位高的家庭中，亲代更有可能和所有子代保持良好的亲密关系，同时亲代在子代家庭决策参与度的提高也有助于改善代际关系。跟一般模型结果相比，多层模型给我们不同的代际亲密关系维持机制。在同一家庭当中，亲代更可能与女儿保持亲密的关系，同时这种亲密关系的维持主要靠的是亲代在日常生活照料中的付出与家庭中的亲代地位。两个模型中最大的变化是居住距离对代际亲密关系的影响，而这也与当前农村社会变迁中讨论比较多的，子代各种形式的移民导致的亲子空间距离的增加对原有代际关系的影响的争论相关，所以将在下一部分重点讨论，并结合家庭现代化理论，检验农村老年代际凝聚力是否下降的议题。

表 6.2 代际亲密关系维持的影响因素分析（系数）

	一般模型		多层模型	
	子代变量	亲代变量	子代变量	亲代变量
子代特征				
男性	-.01	-.05	-.40 [†]	-.57*
年龄	.00	.01 [†]	-.03 [†]	-.05*
经济条件（1=好）	-.07	-.08	.20	.27
居住距离（1=同居/村）	-.28**	-.26**	-.12	-.00
亲代特征				
男性		-.13		-1.69 [†]
年龄		-.01		.06
配偶健在		-.15 [†]		-.83
日常活动能力评价		.10***		.70*
亲代投资				
给予子代盖新房		.07		-.26
日常经济支持		.27*		1.15
日常生活照料		.47***		3.54**
照看孙代		.27**		1.50
亲代家庭地位				
亲代权威强		.73***		6.16***
决策参与度高		.27**		3.33*
截距	-.15	-.80	1.10	-8.69

N	2522	2522	2522	2522
! <0.1 * $p<0.05$ ** $p<0.01$ *** $p<0.001$				

6.2 子代移民背景下代际亲密关系的维持

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城市化过程中子代的各种形式的移民，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本文数据的问卷中，因为没有询问子代在外地的具体原因，所以只能通过居住距离变量间接得出移民的比例。本文数据中，有 42% 的子代不在亲代身边。所以本文接下来要分析的是，在亲代身边的子代和不在亲代身边的子代有哪些特征上的差异？尤其在与亲代亲密关系的维持上是否有着一些机制上的差异？根据家庭现代化理论的经典假设，工业化的特征是亲子间空间上的分离，然后这种分离导致原有家庭结构和关系的破裂，形成新的“现代”家庭形式。本文也将通过分析试着检验这一点。首先看一下移民子代和非移民子代在主要变量上的差异和显著度检验。从表 6.3 中可以看到，除了子代年龄在两个群体中没有显著差异之外，其他变量都存在显著的差异 ($p<.05$)。比如移民子代经济状况和代际亲密关系显著好于非移民子代，不过由于空间距离上的限制，亲子见面频率则远远低于后者。而在代际关系的亲密度上，移民子代与其亲代亲密的比例高于非移民子代，而冲突的比例低于后者。

表 6.3 移民子代与非移民子代主要变量比较

	移民子代 (n=1059)	非移民子代 (n=1463)	显著度
男性	22.00	71.63	*
年龄	44.00	45.24	ns
经济状况：好	33.71	23.24	*
经济状况：一般	55.81	63.57	
经济状况：差	10.48	13.19	
亲子见面频率：几乎每天	6.16	63.71	*
亲子见面频率：每月 2~4 次	40.44	26.36	
亲子见面频率：≤每月 1 次	53.41	9.93	
代际关系：亲密	49.20	42.45	*
代际关系：非亲密	38.62	39.85	
代际关系：差	12.18	17.70	

* $p<.05$ （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或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检验）

为了分析亲密关系维持的机制在移民子代和非移民子代间的差异，本文利用和 6.1 中同样的解释变量，分别在劳动移民子代和非劳动移民子代群体中进行分析和讨论，结果在表 6.4 中显示。

表 6.4 移民与非移民子代亲密关系维持影响因素比较（系数）

	移民子代		非移民子代	
	子代变量	亲代变量	子代变量	亲代变量
子代特征				
男性	.22	.24	-.77 [!]	-.94 [!]
年龄	-.02	-.02	-.03	-.04
经济条件（1=好）	.21	.25	.33	.33
亲代特征				
男性		-.33		-1.76
年龄		.01		.05
配偶健在		-.56		-1.90
日常活动能力评价		.63***		1.01 [!]
亲代投资				
给予子代盖新房		.33		.41
日常经济支持		.84		2.36
日常生活照料		1.12 [!]		5.28*
照看孙代		1.41*		-.32
亲代家庭地位				
亲代权威强		1.38*		9.47**
决策参与度高		.92 [!]		6.62*
截距	.35	-2.69	-7.26***	-13.05
N	1059	1059	1463	1463

! <0.1 *p<0.05 **p<0.01 ***p<0.001

首先看一下性别差异，虽然在 6.2 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亲代更可能与女儿维持亲密关系，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种性别差异只是在非移民子代当中显著，而对

移民子代说，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同时，我们发现移民子代与亲代的亲密关系维持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照看孙代，根据以往研究，这一部分主要是对留守儿童的看护。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类似（比如 Cong et al, 2011），孙子女成为亲代和劳动移民子代间亲密关系的重要纽带。同时亲代的健康状况也是重要解释变量，数据显示亲代身体条件越差，亲代与移民子代间的关系越亲密，这足以说明虽然在空间上隔离，但是在外的子代会通过各种方式对身体欠佳的子代提供各种服务，从而增加了亲密度，也间接对孝道衰竭的论调提出了怀疑。同时对移民子代来说，亲密代际关系维持中亲代权威的作用虽然显著，但效果远远低于非移民子代，说明空间上的距离也导致了原有家庭中的一些权力关系开始发生一些改变，空间的“关系再生产”作用开始显现。而对非移民子代的亲代来说，能够保持亲密关系的有效办法就是日常生活照料上的付出。

6.3 本章小结

本章在上一章代际功能性互动的基础上，讨论代际情感维持的机制。本章中的代际关系研究控制住了家庭内部代际关系间可能存在的非独立性，进而分析子代特征、亲代特征、亲代对子代的投资和亲代家庭地位对代际亲密关系维持的影响。同时，本章还比较亲子居住距离比较近的情况和比较远的情况下可能存在的代际情感关系维系机制上的差别。本章的主要发现结果如下：

1) 整体上，老年亲代更可能和自己的女儿保持亲密的关系，而且在所有子女中，与年纪较小的孩子更可能保持亲密关系。如果从抚养-赡养平衡角度看代际亲密关系维持机制的话，只有亲代对子代的日常生活照料有助于维持代际亲密度。同时家庭权威强，且在子代家庭决策中参与度高的亲代更有可能维持亲密的代际关系。从亲代需求角度来讲，比较意外的结果是较差的健康状况并没有疏离亲子关系，反而使亲密关系的可能性增加。

2) 接着是亲子间的居住距离对代际情感关系的影响。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在控制住来自同一家庭的子代之后，一个家庭内部亲代与移民子代和非移民子代的亲密关系并没有显著差别，可以说空间上的距离至少在情感关系上并没有导致亲子连带的衰弱。但是在亲密关系的维持机制上却产生了一些影响。与近距离子代的关系中，亲代主要靠日常生活支持和传统家庭权威保持亲密性，而与远距离的子代，亲代则主要是依靠照看孙代，虽然家庭权威变量依然显著，但是其影响效果已经远低于住在附近或共同居住的子代。

总之，作为维持家庭凝聚力或是家庭养老保障的重要潜在机制，代际亲密关系的维续在当前的农村家庭中既有传统的延续，又有不同程度的重构。老年亲代

依然在用自己的家庭权威与子代家庭决策中的参与来维系代际间的亲密关系，但同时也在通过自己对子代的付出，尤其是通过不同居住距离子代的不同策略的付出来应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养老保障上的不确定性。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7.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家庭现代化理论、代际关系理论和其他相关理论分析当前农村老年家庭的多维度的代际关系对养老行为的影响，进而分析目前讨论比较多的农村代际关系“失衡”问题。本文的结论如下：

首先是老年代际关系现状的分析，本文从亲代视角出发分别对代际关系的不同维度进行了分析：1) 在代际关系的功能维度上，老年亲代在家庭周期的各个阶段都对子代付出很多，66%的老人曾经为子代出钱盖房，将近一半的老人现在还在为子代提供日常家务或者照看孙代的支持。同时，亲代功能性支持的年龄效应非常明显，除了在为子代盖房这一项上所有年龄群体的老人都付出很多之外，短期金钱支持和非金钱支持上，年轻老人的付出要远远多于年老的亲代；2) 代际间亲密关系呈现较大的性别差异，且随着亲代年龄的变化，代际间的亲密程度也有较大差异。总的来说，父女关系和母女关系相比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更可能保持亲密和较少冲突。如果再考虑亲代年龄的话，母子关系在各个年龄段都比较稳定，而母女关系则在晚年有恶化的趋势。而男性亲代，尤其是年轻的老年父亲更加注重维持与女儿的亲密关系，而父子关系在晚年也有缓和的趋势；3) 最后是代际关系的权力维度。老年亲代的家庭权威在各个年龄段差别不大，有超过一半的老年人报告在子代面前有权威，但在子代家庭决策的参与上，只有较为年轻的老年亲代有比较高的参与度，其比例大约为 50%，而年老的亲代很少参与到子代家庭决策中。但是，亲子间的经济依赖性并没有像代际关系的亲代权力衰弱假设预测的那样降低，两代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性依然非常高。

其次是不同代际关系特征所导致的子代对亲代养老回馈行为的分析。根据亲代对子代养老回馈的多元化需求，本文对子代经济回馈和情感回馈两种不同类型的养老行为分别进行分析，并对两者的机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如下：1) 在经济赡养上，亲代对子代的抚育和支持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回报，抚育更多子代、为子代盖房、给子代照看孙代确实能够显著提高获得子代经济支持的概率，维持了一

定的代际平衡。但是问题是这种平衡更多是一种工具性平衡，依靠的是一种义务和老人的大量投入，而不是基于亲子情感，所以充满不确定性，且仅能维持老人基本需求，远远谈不上善待。2) 而在情感赡养上，本文发现代际失衡和平衡并存。失衡体现在亲代对子代的各种付出并非是子代考虑给予亲代情感支持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子代在情感上的回馈并非来自亲代的投资。相反这些支持来自亲子间亲密的情感关系。本文发现老年亲代在晚年所能维系的亲密子女的数量，尤其是亲密的女儿数量是获得子代情感支持的重要因素，所以可以说维持了一种情感上的代际平衡。不过考虑到获得情感支持的老年人比例远低于经济支持，加上亲代对情感支持需求的日益增长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意义，代际间的情感平衡还远远谈不上理想；3) 不管是经济支持还是情感支持上，老年人的需求和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维系的亲代权力机制依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本文发现亲代的经济收入越低，越有可能获得子代经济支持，而子代也为卧病在床的亲代提供更多的情感慰藉。亲代的家庭地位也影响子代支持的获得。亲代在家庭中的权威越高，越有可能获得子代经济、情感的回馈，而亲代对子代家庭决策上的高参与度也能换回与子代的情感互动。所以虽然内部逻辑可能存在差异，但是整体上，代际关系与养老行为维持了一定的平衡，虽然谈不上最理想的平衡类型，但也绝非全面失衡。老年人晚年生活获得了基本维系，但是内部机制千差万别，且正在发生改变，处于一种过渡阶段，存在不确定性。

最后是代际亲密关系维持的影响机制分析。本文在前述代际关系现状描述性分析和代际功能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家庭当中亲代老人与其所有子代的亲-子配对数据，在控制家庭层次变量的基础上，分析如何才能维持一个亲密的代际关系，从而保障稳定的代际平衡。本文结果如下：1) 在代际情感关系的维持上，亲代的投资部分有效，仅日常生活照料一项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亲代家庭地位也对代际亲密关系的影响较大，即亲代家庭权威越强，参与子代家庭决策的程度越高，越可能和子代保持亲密关系。比较意外的结果是亲代身体条件的衰弱反而增加了亲子间的亲密度，这对“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论调提出了一定的质疑；2) 本文还讨论在目前的农村，城市化推动下的大规模的各类子代移民趋势有没有导致亲子间情感上的隔离，进而可能影响其养老行为的问题。本文发现，与亲代亲密关系的维持上，在老人身边的子代和在外地的子代没有显著差异^①。只是在亲密关系维持的机制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对在身边的子代来说，亲密的代际关系来自于老年亲代在日常生活照料上的付出。而对外地的子代来说，亲密关系则更多源于亲代在照料孙代上的投入。另外，亲代家庭地位变量，虽然对这两类子代的亲

^① 在控制了家庭层次的模型中，其差异几乎等于0（参见表6.2）。

密关系的维持上都有显著效应，但是对近距离子代的效应远远高于远距离子代。

总之，农村老年家庭代际关系体现为一种功能上的平衡和情感上的失衡，老年人对子代贯穿生命历程的抚养和支持虽然换回了子代基本生活保障的支持，但是亲子情感关系却发生着变化。农村社会变迁虽然并没有导致代际关系上的全面失衡，但是传统的代际平衡的维持机制上正在发生着较大的变迁，体现在亲代付出上的增加和性别期待上的变化。另外，不管在哪种养老行为的影响机制上，亲代需求依然是子代养老行为的重要考虑因素，至少在目前的农村，传统孝道还能维持老年亲代基本的养老需求。而亲代家庭地位在每个代际关系维度中都很重要，但很可惜本文的变量不能解释如何获得更高的家庭地位^①。

结合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认为较为理想的代际关系是一种亲子间的有限责任、突出亲情关系、关注老年人多元化需求的亲密关系。而与之相对应的代际平衡便是代际之间互惠、情感和责任之间的平衡，及其平衡下的子代基于亲情关系的养老支持。

7.2 假设验证与理论回应

这一部分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列出第3章提出的5个假设的验证结果，并结合第2章的综述思路，从理论角度做出回应。首先是假设验证：

对于假设1中的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思路，本文发现在经济赡养上确实存在符合此种逻辑的地方，即根据交换逻辑而非情感逻辑的子代支持支持。但在情感支持上，亲密关系起着显著影响，亲代投资失去效应。假设1部分得证。

对于假设2的验证结果与假设1类似。团结型理想模型在中国农村，既存在符合的一面，也存在不符合的地方。首先，亲代对不同特征子代的不同形式的支持确实有助于维持亲密关系，同时亲密关系确实也能够提高获得情感支持的可能性。但是这种逻辑仅仅适用于比例相对较少的情感支持，而非经济赡养，后者依然是遵循一种假设1中的逻辑。

假设3是利他模型的验证，跟以往中国研究结论（怀默霆，2001；Lee et al, 1994, Sun, 2002）类似，利他/共同体模型在中国农村的代际关系中依然有效，不管代际间亲不亲密，那些经济条件差的、身体不好的亲代，依然能够从子代处获得必要的支持，假设3完全得证。

假设4中的权力假说思路证明有效，不仅经济上亲子两个家庭依然联系在一起，而且在亲密关系维持和养老支持获得上，家庭地位都有效提高其可能性。

^① 对于亲代家庭地位的影响因素分析，因为数据中的解释变量不能给出任何解释，所以没有在本文列出。

对于假设 5 所述的回馈模型，本文认为要根据具体情况去理解互惠，即不是所有的亲代投资都能得到子代的回馈，同时又对于不同子代、不同类型的投资回报都有所不同，假设 5 部分得证。

而从理论角度思考的话，当前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行为，不是简单的哺育与反哺，抑或是理性的工具性交换关系，更不是彻底的亲子断裂，而是朝着一种新型的代际关系发展，处于一种过渡状态。在这种背景下，目前的代际关系是一种功能关系与情感关系并存，亲子间既维持着频繁的功能性互动，包括亲代对子代大量的投资和子代对亲代老人的各类养老支持，同时又有着一种弱化工具关系、强化情感关系的倾向。而这种情感关系的维持，亲代需要更多的策略性的思考，而不是仅仅依赖传统规范的束缚。

7.3 讨论与不足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验证现代化理论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解释，并从代际关系视角重新审视目前讨论的农村代际关系失衡及其导致的养老危机问题。本文发现，家庭边界在现代化变迁当中依然涵盖了老年亲代和成年子代两代核心家庭，代际间依然进行着广泛的互动，包括亲代对子代无私的投入和子代对亲代各种类型的赡养支持。但是同时，本文也发现，相比亲代对子代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贡献，亲代能够从子代处获得的回馈则处在一种不确定性的风险当中。这主要体现在代际功能性平衡背后的情感缺失，及情感关系维系机制的重构当中。总的来说，在当前的农村老年家庭中，老年人养老保障在不确定性增加的代际关系中维持着一定的平衡，但是如何确保家庭养老功能的保障，笔者认为还是需要代际互动中培养起来的情感关系，这也是以后代际关系研究中必须要更加关注的地方。

本文与过去的家庭养老研究不同的是，不仅关注亲代获得的经济支持，也关注亲代的非经济需求和代际互动背后的潜在情感关系，比如本文讨论的子代情感支持和代际间的亲密关系的维系。没有情感的纯工具性代际关系，笔者认为终究要陷入到更广泛的家庭养老危机中。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认为家庭养老既然是家庭当中子代间的一种代内分担与合作的关系，就要考虑到亲代与所有子代的关系，进而进行家庭养老相关的结论推导。

另外，本文在讨论国内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中普遍使用的“代际失衡”概念时，并没有局限在某一代际关系维度的失衡上，而是结合相关理论，尤其是目前西方研究中使用比较多的代际团结理论视角，去分析失衡与平衡的复杂性和多元化机制。代际团结视角在目前各国的代际关系与养老研究中都有所体现，比如

严原 (Izuhara, 2004) 基于团结理论比较日本和英国老人在继承和家庭养老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家庭养老的潜在机制正在日本发生变化，虽然目前由于社会转型，老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心态，但是代际关系的功能性正在降低，情感性正在增加。而杨菊华等 (2009) 对东亚四地区的调查数据的分析也指出家庭代际团结依然维持，只是形式上发生着改变。郭曼等 (Guo et al, 2012) 也是在代际团结理论脉络下，为代际关系的多样性视角做出了贡献。本文也希望加入到理论讨论中，在与国外研究的比较和借鉴中，为中国问题的探究做出贡献。

最后谈一下本文局限。本文数据的最大问题是它是一个截面数据，仅仅能分析当下的特点，不能更准确地看到代际关系变迁的全貌。比如本文所能讨论的社会变迁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只能仅仅通过年轻老人和年老老人的比较来看相对变化，或者通过既存变迁结果来分析变迁可能带来的影响。这其实有非常大的隐患，比如关于不同年龄群体间的比较，徐晓锋 (2010)⁵⁶⁻⁵⁷ 的文章中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指出那些曾经做儿子、媳妇时充分表现出个人权利意识、要求独立的年轻人，到了自己成为中老年亲代之后，没有继续坚持自己的个人主义，反而像自己的父母一样，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子代付出。所以这里就提到了社会变迁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目前的前沿方法称之为年龄效应、时代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划分。本文在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提过这个方法及应用，笔者认为这也是以后家庭养老变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而为了真正能够了解社会变迁对代际关系的影响，本文也只能期待以后更多基于追踪调查或者是长时段调查数据的分析。

参考文献

- [1] 贝克尔. 家庭论[M]. 王献生, 王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2] 陈柏峰. 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J]. 社会学研究, 2009(4): 1-21.
- [3] 陈皆明. 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1998(6): 131-145.
- [4] 陈皆明. 中国养老模式: 传统文化、家庭边界和代际关系[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30(6): 44-50.
- [5] 范成杰. 代际失衡论: 对江汉平原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一种解释[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2009.
- [6] 郭于华. 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G]// 郭于华. 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7] 贺雪峰.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J]. 江海学刊, 2008(4): 108-113.
- [8] 贺雪峰. 农村代际关系论: 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J]. 社会科学研究, 2009(5): 84-92.
- [9] 贺雪峰, 郭俊霞. 试论农村代际关系的四个维度[J]. 社会科学, 2012(7): 69-78.
- [10] 怀默霆. 中国家庭中的赡养义务: 现代化的悖论[J]. 中国学术, 2001, 3(4): 255-277.
- [11] 金一虹. 流动的父权; 流动民工家庭的变迁[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4): 151-165.
- [12] 勒菲弗. 空间与政治 (第二版) [M]. 李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13] 林蔼云. 漂泊的家: 晋江—香港移民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6(2): 134-161.
- [14] 刘爱玉, 杨善华. 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老年人家庭支持研究[J]. 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37(3): 59-70.
- [15] 刘桂莉. 眼泪为什么往下流?——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倾斜问题探析[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36(6): 1-8.
- [16] 刘晋飞. 农村子女对父母的家庭代际转移研究——基于河南元村的实地调查[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2012.
- [17] 刘汶蓉. 家庭价值的变迁和延续——来自四个维度的经验证据[J]. 社会科学, 2011(10): 78-89.
- [18] 刘汶溶. 成年子女支持父母的观念、行为及其影响因素[J]. 社会科学, 2012a (2): 22-32.
- [19] 刘汶溶. 反馈模式的延续与变迁: 一项关于当代中国家庭代际支持失衡的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2012b.
- [20] 刘岩. 转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流动——产权的维度[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2010.
- [21] 孟宪范. 家庭: 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23(3): 133-145.

- [22] 潘鸿雁. 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23] 沈奕斐. 个体家庭 iFamily: 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
- [24] 宋璐, 李树苗. 当代农村家庭养老性别分工[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 [25] 唐灿. 近期国内家庭研究的理论与经验: 1995~2007[G] //唐灿. 家庭与性别评论(第1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32.
- [26] 唐灿, 马春华, 石金群. 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J]. 社会学研究, 2009 (6): 18-36.
- [27] 唐灿. 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J]. 社会学研究, 2010(3):199-222, 246.
- [28] 唐有财, 裴晓梅. 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 社区的潜力[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0(1): 99-103.
- [29] 王萍, 李树苗. 农村家庭养老的变迁和老年人的健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 [30] 王跃生. 当代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比较[J]. 社会, 2006, 26(3): 118-136.
- [31] 王跃生.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J]. 人口研究, 2008, 32(4): 13-21.
- [32] 王跃生.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维系、变动和趋向[J]. 江淮论坛, 2011a (2): 122-129.
- [33] 王跃生.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内容及其时期差异[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1b (3): 134-140.
- [34] 王跃生. 城乡养老中的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以 2010 年七省区调查数据为基础[J]. 开放时代, 2012 (2): 102-121.
- [35] 王跃生, 伍海霞. 当代农村代际关系研究——冀东村庄的考察[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36] 谢桂华. 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J]. 社会, 2009, 29 (5): 149-167.
- [37] 许琪. 子女需求对城市家庭居住方式的影响[J]. 社会, 2013 (3): 111-130.
- [38] 许琪, 李建新, 于学金. 婚姻与家庭[G] //谢宇, 张晓波, 李建新, 等.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3.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305-343.
- [39] 徐晓锋. 家庭生命周期的转型: 20 世纪以来家庭结构变迁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2010.
- [40] 鄢盛明, 陈皆明, 杨善华. 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1): 130-140.
- [41] 阎云翔. 家庭政治中的金钱与道义: 北方农村分家模式的人类学分析[J]. 社会学研究, 1998(6): 74-84.
- [42]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M]. 龚小夏,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 [43] 杨菊华, 李路路. 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9 (3): 26-53.
- [44] 杨善华, 贺常梅. 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

-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41(1): 71-84.
- [45] 张婷婷. 社会转型与乡村代际关系研究: 基于文献的述评[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28(3): 42-48.
- [46] 张卫国.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改革开放后中国北方农村已婚妇女娘家日益密切的关系[G]// 黄宗智. 中国乡村研究 (第七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 292-315.
- [47] 张烨霞, 靳小怡. 中国城乡迁移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 (3): 31-40.
- [48] 张翼. 中国老年人口的家庭居住、健康与照料安排——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13(1): 57-65.
- [49] 赵爽.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 文化与结构结合的路径[J]. 青年研究, 2010(1): 47-53.
- [50] 朱静辉, 朱巧燕. 温和的理性——当代浙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13(10): 99-105.
- [51] 左冬梅, 吴正. 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的年龄轨迹研究[J]. 人口研究, 2011, 35(1): 53-64.
- [52] 左冬梅, 李树苗, 吴正.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成年子女角度的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 2012, 34 (4): 26-34.
- [53] Becker G S.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Life[R]. Nobel Prize Committee, 1992.
- [54] Bengtson V L. Beyond the nuclear family: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multigenerational bond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1, 63(1): 1-16.
- [55] Bian Fuqin, Logan J R, Bian Yanji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urban China: Proximity, contact, and help to parents[J]. Demography, 1998, 35(1): 115-124.
- [56] Chen Feinian, Liu Guangya, Mair A C. Intergenerational Ties in the Context: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J]. Social Forces, 2011, 90(2): 571-594.
- [57] Cong Zhen, Silverstein M. Intergenerational time-for-money exchanges in rural China: Does reciprocity reduc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older grandparents? [J].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2008, 5(1): 6-25.
- [58] Cong Zhen, Silverstein M.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parents and migrant and nonmigrant sons in rural China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1, 73(1): 93-104.
- [59] Guo Man, Chi I, Silverstein M. The structur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rural China: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2, 74(5): 1114-1128.
- [60] Hareven T K. Aging and generational relations: A historical and life course perspective[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4, 20(1): 437-461.
- [61] Hogan D P, Eggebeen D J, Clogg C C. The structure of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s in American famil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 98(6): 1428-1458.
- [62] Hvistendahl M. Can China Age Gracefully? A Massive Survey Aims to Find Out. SCIENCE [J]. 2013, 341: 831-832.
- [63] Izuhara M. Negotiating Family Support? The ‘Generational Contract’ between long-term Care and Inheritance[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04, 33(4): 649-665.

- [64] Kohli M.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inheritance: A comparative view[J]. Annual Review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2004, 24(1): 266-289.
- [65] Lee Y J, Parish W L, Willis R J.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aiwa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 99(4): 1010-1041.
- [66] Logan J R, Bian Fuqin. Parents' needs, family structure, and regular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al exchange in Chinese cities[J]. Sociological Forum, 2003, 18(1): 85-101.
- [67] Luo Baozhen, Zhan Heying. Filial Piety and Functional Support: Understanding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mong Families with Migrate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J]. Aging International, 2012, 37(1): 69-92.
- [68] Lüscher K, Pillemer K. 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 in later life[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8, 60(5): 413-425.
- [69] Pei Xiaomei, Tang Youcai. Old age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development [J]. IDS Bulletin, 2010, 41(4): 22-30.
- [70] Powers D A, Xie Y.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M].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2008.
- [71] Rabe-Hesketh S, Skronda A. Multilevel and longitudinal modeling using Stata (2nd ed.) [M]. College Station, TX: Stata Press, 2008.
- [72] Silverstein M, Bengtson V L.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adult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s in American Famili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 103(2): 429-460.
- [73] Silverstein M, Conroy S J, Wang Haitao, et al. Reciprocity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 over the adult life course[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2, 57(1): S3-S13.
- [74] Silverstein M.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transfers in social context[G] //Binstock R H, George L K. 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lsevier, 2006:165-180.
- [75] Silverstein M, Gans D, Yang F M.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o Aging Parents The Role of Norms and Needs[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06, 27(8): 1068-1084.
- [76] Silverstein M, Giarrusso R. Aging and family life: A decade review[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0, 72(5): 1039-1058.
- [77] Sun Rongjun. Old age support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from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s perspectives[J]. Research on Aging, 2002, 24(3): 337-359.
- [78] Swartz T T.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s in adulthood: Patterns, variations, and implica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9(35): 191-212.
- [79] Xie Yu, Zhu Haiyan. Do sons or daughters give more money to parents in urban China?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9, 71(1): 174-186.
- [80] Yang Hongqiu. The distributive norm of monetary support to older parents: A look at a township in China[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6, 58(5): 404-415.
- [81] Zimmer Z, Kwong J. Family size and support of older adul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Current

effects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J]. Demography, 2003, 40(1): 23-44.

致 谢

衷心感谢导师裴晓梅教授和社会学系其他老师的谆谆教诲。裴老师不仅在学业上使我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更是在做人做事方面也使我获得了不少的成长，能够在裴老师指导下完成硕士学位的学习，真的感到非常荣幸。

感谢清华大学老年学研究中心为本文的分析提供的数据。因为深知数据的来之不易，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更加严谨，努力分析数据展现的真问题。

感谢硕士期间所有帮助过我的师兄、师姐及硕士 12 级同窗。当然，最感谢的还是我的父母，能够鼓励我一直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不包含任何他人享有著作权的内容。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签 名： _____ 日 期： _____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个人简历

1989年08月17日出生于吉林省龙井市。

2008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实验班，2012年7月本科毕业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2012年9月免试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至今。

发表的学术论文